
高 教 动 态

总第 1 期 2005 年第 1 期

嘉兴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主办

2005 年 6 月 25 日

本 期 要 目

●理论动态●

高等学校定位问题辨析	1
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你的位置在哪里	5
“地区一流”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策略	9
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	11

◆ 高教改革◆

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	15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思路与未来展望	18
上海高校：“教授”职称变职务	21

■学术争鸣■

过去教授的精神气质与现在教授的“身份危机” 21

教授●教学●大学●大爱 23

◆校长论坛◆

中外大学校长纵论我国高校建设四大热点 26

大学校长纵论治校之道 28

“圆桌会议”：聚焦大学发展战略 29

大学定位：有特色才有生命力 31

★海外高教★

美国《新闻周刊》谈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现状 33

日本大学改革的最新态势 35

▲会议动态▲

2004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专家谈高校发展与定位 36

OECD：给中国高等教育的政策建议 37

●论点摘要●

论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 40

中国大学排行的比较分析 40

●理论动态●

高等学校定位问题辨析

解飞厚 湖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等学校的定位意识逐渐增强，特别是高校合并、扩招后，高校定位已成为高校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当前我国高校定位出现的问题表现为两个方面：办学类型的趋同与办学层次的攀升。在办学类型上，普通高校都要办成综合性、多科型、学术性的大学；在办学层次上，都要办成本科、硕士、博士一体化，国(省)内一流、世界(中国)知名的高水平大学。高校定位的趋同与攀升具体表现为：你有 30 个专业，我要办 40 个；你有 1000 亩校园，我要有 2000 亩；你有 30 个硕士学位点，我要有 40 个；你有硕士点，我要有博士点；你有 30 个博士点，我要有 40 个；你有 1 亿科研经费，我要有 2 亿，等等。

把高校间的趋同和攀升看作是一个问题，是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认识的。社会越发达，分层和分工就越精细。处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高校应该有分层和分工，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协同发展，在定位上体现出个性化和多样化。但是高校定位的趋同和攀升有违社会发展规律，与我国正在实施的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是背道而驰的。教育部把高校定位问题作为高等学校近几年要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之一，由此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

二、高校定位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

对高校定位出现的问题，应该用辩证的方法作历史的分析和考察。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高等教育亦如此。处在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高等学校的发展定位是不一样的。在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高等学校数量很少，高等教育需求大大超过供给，学校的生存空间很大，对定位无需作过多的考虑，甚至不需要考虑定位，都能够发展得很好。在高等教育的成长阶段，高等学校数量发展很快，学校规模也迅速扩张，高等教育从供不应求向供求平衡过渡，学校的生存空间变小，相互间的竞争加剧，学校必须考虑定位问题。在高等教育的成熟阶段，高等学校数量基本稳定，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处于一种动态平衡，学校之间的分化基本完成，学校的定位亦基本形成，绝大多数学校在适合于自身的层次上“安居乐业”。

一般认为美国高校的定位是较为成功的，其高校分为四大类：一是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占总数的 6% 左右；二是授予硕士学位的高校，占总数的 14% 左右；三是授予学士学位的高校，占总数的 30% 左右；四是社区学院，占总数的 50% 左右。总体上看，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金字塔结构。美国高等教育尽管只有 300 多年历史，然而，美国是市场经济发育最成熟的国家，加上各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遇，其高等教育得以以最快的速度渡过起步和成长阶段，成为世界上高等学校数量最多、高等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在总结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时，有学者认为，美国高校在发展之初的定位“不拘一格”保证了高校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笔者认为，美国高校的个性化和多样化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而不是高等教育的初始状况，大多数高校在发展之初的定位与今天的实际位置可能有天壤之别。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各高校在高等教育的成长阶段，其定位也会出现诸多问题，它们在市场竞争中不断调整定位，逐渐找到自身位置。近代高等教育起源于欧洲，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后来者居上，是因为美国先进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其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时至今日，美国各高校所处位置

也只是相对稳定，部分学校仍在不断地变动，包括类型的转换和层次的演变，新学校的诞生和老学校的倒闭。没有转换、演变和生死交替，美国的高等教育就会失去活力，就不可能长期占据世界高等教育的制高点。

我国高等教育从西方移植而来，至今只 100 余年，除去中间的坎坷与曲折，真正发展的时间就更短。无论从规模、水平、结构还是从效益来看，我国高等教育都处在成长的初期，高等学校也在发展和分化，除了极少数学校的定位明确以外，绝大多数学校的定位在不断地变换和调整，因为发展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太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与整个社会发展阶段相关联，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立之中，与高等教育相关的人才市场很不成熟，用人单位的人才高消费，加剧了高校定位的趋同和攀升；同时，高等教育的社会评价刚刚开始，以科研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为主要内容的评价体系对高校定位的趋同和攀升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此可见，高等学校的定位既受高校自身发展阶段的制约，又受高校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处在大发展、大分化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希望大多数学校在短时间内都能准确定位，或者定位出现了问题的高校希望政府能出面解决，由政府帮助各学校定准位置，那只能是理想，甚至是神话。高等学校定位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要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分析利弊，使其朝着有利于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方向转化。

三、“趋同”与“攀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注中国宏观经济的人都知道，重复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冰箱、彩电、汽车等行业在上个世纪都经历过重复建设的热潮，近几年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领域的重复建设亦十分严重。多年来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重复建设问题，2002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不能搞重复建设和单纯扩大生产能力”，2003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强调“坚决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然而，重复建设屡禁不止。管理学上有一条定律：如果一个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说明这个问题有存在的合理性。在多数人批评重复建设，分析问题的原因及寻找解决策略时，有人提出，“有重复建设才有竞争”。支持这一论点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美国在 1892—1928 年的 30 多年中，曾经有 1500 多家汽车制造公司，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18 家，经过激烈的竞争，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汽车生产才基本上集中到了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家公司。试想，如果没有众多公司的激烈竞争，这三家公司能成为享誉世界的汽车制造公司吗？由此可见，重复建设是市场经济必须付出的成本。有人甚至认为，“重复建设”是个伪命题。

尽管高等教育领域与经济领域存在重大差异，高等教育市场远没有经济领域中的市场成熟和健全，但我国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用经济领域的观点分析高等教育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么，根据经济领域对重复建设的讨论，我们有可能重新认识高校的定位问题。从宏观上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学校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竞争，更谈不上有高等教育市场。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后，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高等教育市场逐渐形成和发育起来。建立和健全中国的高等教育市场需要各高校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竞争是市场的本质特征，而趋同是竞争的前提条件。高等学校定位中一定程度的趋同可导致学校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结果一方面是高等学校的分化，各自找到自身的位置；另一方面是促进高等教育市场的发育与成熟，包括市场规则的成熟和市场主体的理性化。可见，学校定位中适度的趋同对于高等教育市场的建立和健全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微观上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高校最大的问题是自主性不强，发展动力不足，办学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后，高校自我发展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各高校在校际比较中为自

身定位，即所谓的攀比，目的是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校际相互攀比正是学校勇于开拓、积极向上的表现，当然，这里的攀比是有一定依据的，符合“摘桃子”理论。如果大多数高校仍然是面向政府等、靠、要，在定位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那才是最可怕的，中国高等教育就没有希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成长中的高校以高于现实的目标为自身定位是无可非议的。为实现定位，高校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挖潜增效，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尽管竞争以后可能有一部分高校实现不了最初的定位，甚至有少数高校被淘汰，导致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但更多的高校会因此得到超常规发展。综合分析，计算得失，高校定位中的攀比对于提高高等学校办学效率具有积极意义。

四、高校定位与政府的宏观调控

“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经济领域中的重复建设之所以遭到那么多人的批评，是因为过度的重复建设确实带来惊人的资源浪费。高等学校的定位亦如此，如果各校自行其是，完全失去控制，其负面效应不仅会抵消上述的积极意义，还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因此，需要采取多种措施，趋利避害。

1. 高校定位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

处在自由市场经济时代，在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时期，政府对市场采取不干预政策。美国汽车工业在世界上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机制和先发优势，但其中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先发优势，按照自由竞争的方式是走不通的，既浪费不起资源，又没有足够的时间，但我们有后发优势，即吸取自由市场经济的教训，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发展我国的产业，尽可能地减少浪费。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两只手”共同作用，在微观领域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控，在宏观领域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调控。因此，对于经济领域中出现的重复建设问题政府不可以视而不见，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将重复建设降低到一定水平，既保持适度有序的竞争，又防止过度重复建设带来的浪费。可见，重复建设确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伪命题。

按照上述思路讨论高校定位问题，我们同样可以得到类似结论，即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是需要的，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适当超越现实的定位有利于高校竞争和高等教育市场的发育，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但高校之间的竞争又应该是适度的和有序的，高校定位过于趋同和无原则攀升必然导致无序竞争，最终损害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应该而且可能通过宏观调控影响和引导高校定位。

2. 高校定位中政府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

政府有多种手段调控高等学校，如政策法规手

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信息手段等，其中经济手段是最常用的，也是较为有效的手段。高校能否顺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竞争中获得的资源。高等教育不同于一般行业，政府投入占教育资源的绝大部分，高校竞争资源的首选目标是政府的投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政策对高校定位有着重要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211工程”、“985工程”，各省、市重点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等项目的实施过程，无一不是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过程。谁赢得这些项目谁就能获得相当可观的资源。在项目评审中，政府领导和评委既要看学校的基本条件，又要看学校的发展势头，定位在发展势头中处于重要位置。定位高，说明学校上下精神状态好，积极向上，因而有利于争取立项。那么，学校迎合政府的需要做出自己的定位是必然的选择。由于国家和地方的高等教育建设项目基本上集中在高端，高校只有跻身金字塔的塔尖才可能赢得这些项目。不同层次高校最后的定位如果都是一个取向，必然导致趋同和攀升。

以获取政府资源为目的的学校定位，已成为宣传学校的一种手段、一种包装，其定位亦被异化。学校领导无需考虑以后如何实现自己的定位，只是为了赢得投资者的好感，这样的

竞争当然是无序竞争，最终导致资源的浪费。^[5]由此可见，目前高校定位的趋同和攀升并非真正意义上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政府导向的结果。那么，如此的趋同和攀升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没有积极意义，还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对此，政府应负主要责任。

3. 政府分类分层投资，引导高校正确定位

我国高等教育需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十几所甚至几十所高水平的大学，但这毕竟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全部。同理，发展研究生教育，特别是最高层次的博士生教育也是完全需要的，但这也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全部。高等教育是分类分层的，相应地，高等学校也是分类分层的，如何建设好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普通高等学校，如何促进高校抓好本科教育，如何保证高校在各自的类型和层次中展开竞争，使其中最优秀的高校又能向高一层次提升，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政府资源配置的导向。

政府在运用经济手段分配高校资源时，应当遵循分类分层投资的原则，既要保证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上水平，又要保证以本科为主的高校集中精力抓好本科教育，以专科为主的职业高等学校集中精力抓好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

其实，教育主管部门早已认识到本专科教育的重要性，对目前学校定位的批评就是要求多数学校把重心转移到本专科教育上来。本科教学评价是教育部为保证高校抓好本科教育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被评学校对本科教学评价也有高度的重视，但由于评价结果与政府教育经费的投入没有实质性挂钩，教学型高校的质量无论有多高，政府的教育投入也没有相应的增加，相反，亮黄牌的学校还可以得到政府额外的投入；此外，评价结果在社会上的信息透明度不高，学校的知名度很难通过本科教育质量得到提高，因而也难以吸引优秀生源和社会教育资源。由于抓本科教育难以形成特色和优势，因此很多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学校不得不向研究生教育攀升，且花大气力抓科学研究，以此赢得政府的投入和通过提高学校知名度赢得社会教育资源。要使本科教学评价真正落到实处，在学校定位中发挥作用，政府必须将评价结果与投入挂钩，对于本科教育质量优秀的学校，要有足够的投入，以此吸引同类学校把主要精力用在本科教学上；同时还要加大宣传力度，使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能选择这样的学校。

把本科就业率纳入高校评价是近年来教育部推出的新举措，这对于学校抓好本科教育质量，根据社会需要调整专业结构，抑制学校贪大求全的办学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措施中存在的问题与本科教学评价中的问题相同，即就业率评价没有与政府投入挂钩，对学校没有造成压力。可以设想，政府投入一旦与就业率挂钩，学校在专业设置和培养规格上就必须以人才市场为取向，满足市场需要，学校的专业特色在市场导向中才可能形成。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分类分层投资的原则就是要使每一个类别、每一个层次的高校认识到，只要做得好，都能获得政府足够的投入，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那么，在细分的高等教育市场中，高校定位的趋同和攀升就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既保持适度有序的竞争，又能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过度的趋同和攀升将被遏制。

五、改革政府与高校间的隶属关系

客观地说，目前学校定位一般是学校主要领导对学校的定位，师生很少有机会参与，即使参与也是走过场。由于主要领导是由上级任命的，那么他们对学校定位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学校全体师生员工负责。“假大空”、贪大求全的陋习在政府部门中仍有市场，“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在高校并不鲜见，学校领导为了反映自己的雄心壮志，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绩，他们的定位只能高而不能低，否则就说明他们无能，辜负了组织的期望。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有一部分学校领导的定位是为了表现个人，是为了博得上级的首肯，那么，这种学校定位已经被异化。另外，由于定位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只对上级负责，学校师生很少关心

定位是如何出台的，更不关心定位最终能否实现，结果多数学校的定位是以口号的形式出现，如高水平大学、国内一流、国内知名等，无人检验、无法检验也无需检验。显然，这里不能简单地批评学校校长或书记，产生问题的原因在于政府与学校的隶属关系。

改革政府与高校间的隶属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取消政府与高校的上下级关系。高校就是一个独立的办学实体，没有行政级别，学校在国家法律的规范下自主办学，校长在学校内民主产生，校长向全体师生员工负责而不是向上级负责，校长的罢免权在学校而不是在政府部门；政府对学校管理主要是宏观管理，用间接的手段调控学校的行为。取消政府与高校间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以后，学校定位就不仅是校长和少数几个领导的事情，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反映学校绝大多数师生的愿望，并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定位说到底就是目标管理，是目标的集中体现，应有中期与远期可检测性的指标，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学校没有实现定位，学校校长就应当被罢免或者引咎辞职。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学校才可能改变定位中的个人意志，增强民主性；改变定位的空洞与泛化，增强内容的可操作性，并在严密的监督之下保证定位落到实处。有了这样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在高校定位中还有哪位校长敢不切实际地趋同和攀升？

——摘自《高等教育研究》（武汉）2005，（3）

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你的位置在哪里

湖南省委党校 徐晨光

一、高校定位问题是当前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紧迫课题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本质上就是高等教育不断满足经济、政治、社会发展需求的过程，一方面，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促使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为了使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发展和规模扩张的要求，必须对原有高等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和更新。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必然伴随着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重大变革。纵观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状况，各国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都相应地实现了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多样化、管理的民主化与分权化、院校的个性化、教育结构的合理化等多方面的变化。而要实现这一系列的变革，就必然使如何明确高校定位问题突显出来。只有明确了高校定位问题，才能有利于建立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的高等教育体系；只有实现高校的准确定位，才能形成各具特色的多样化的办学模式，适应不同层次的学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只有高校找准了自身位置，才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保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健康发展，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使高校的准确定位成为历史的必然。

另外，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各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都十分重视高校定位问题。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国家，在其大众化进程中，就逐渐形成了以学术研究型大学、拥有博士授予权大学、拥有硕士授予权的综合型大学、拥有学士授予权的普通学院和社区学院为主要层次的具有美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德国高等教育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的，相应地也形成了综合大学、高等专科学院、职业学院、远程

学院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国家都是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实现高等教育类型多样化的，并且各种类型和层次的高等学校定位明确，具有各自的培养目标、模式和特色，在大众化高等教育中担负着不同使命，发挥着不同作用，彼此之间呈现出一种互补的、不可替代的关系。

而相对来说，我国的情况并非如此，近年来在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的情况下，人们却很少关注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大学定位问题，出现了大量定位模糊或大学角色错位现象。

一是高等教育扩充的无序性。 1999年扩招以来，大量扩招任务落在原有的全日制普通高校身上，许多重点大学也承担了沉重的扩招任务，除原已承担的成人教育学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班等之外，扩招之后，一些高校又增办高职学院、网络学院和名义上的民办二级学院。有的地方，甚至鼓励名牌大学以其无形资产创办二级学院，不断扩大办学规模，以致形成了许多重点大学花费大量精力与一般院校、民办学校争抢生源的现象。**二是要求“升级升格”的盲目性。**一些办学水平一般的中等学校想方设法申报高职学院，高职高专则热衷于“专升本”，升了本科的学校就要办成多科性大学，进而争取评上硕士、博士授予单位，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目前全国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除极少数独立的公办高职和民办高职外，都基本上以办成国内（或省内）一流，国外（或全国）有影响的多科性、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作为制订发展战略的目标，各级各类学校同奔一条道的现象十分明显。**三是培养目标盲目向“高精尖”看齐的现象。**一些一般的高等学校不从自身实际出发，盲目地追求培养高层次人才，部分专科层次的学校甚至按照本科模式组织培养，成为本科的“浓缩”，培养创新性复合型拔尖人才几乎成为各级各类高等学校的共同追求。这些现象的存在极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极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极不利于高等院校自身的发展，也极不利于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它不仅会造成我国人才结构的失衡，影响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教育质量，而且还会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从整体上制约和延缓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因此，实现高校的准确定位已成为当前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

二、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影响高校定位的主要因素

认真考察和分析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制约和影响高校定位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1、传统高等教育观念的影响。一是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片面认识。一方面，把高等教育大众化等同于高校的大众化，各级各类高等院校都盲目地扩大办学规模，部分重点大学丧失其原有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顺应扩招的潮流，促使同校同专业中的学生层次差距增大，生源质量千差万别，给学校的教学和对学生的培养带来了很大困难；另一方面，把高等教育大众化视为对精英教育的排斥，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是要让更多的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带来教育质量的下降，大众化高等教育和精英教育作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可同时存在，因此，部分重点大学放弃其精英特征，盲目扩大办学规模，与一般的院校共同承担大众化教育任务。二是重学术轻职业的传统高等教育价值观念的影响。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人们往往对学术水平高的研究型大学表现出无以附加的推崇，而对职业特点较强的高职高专相对看轻，国家在某些具体的政策性措施的制定上也加重了这种思想，促使许多学校盲目追求高学历层次和综合化，办学之路越走越窄，并且引起高校之间的无谓竞争。同时，在人才培养上，许多学校比较注重学术型人才的培养，以学生的学术水平和能力作为衡量标准，甚至部分高职院校也有这种倾向，忽视了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在培养过程中往往把学生的知识结构与行业要求分割开。三是传统高等教育文化观念的影响。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大学生实行包分配，这样，“出了大学门，就是国家人”，同时再加上我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的影响，实际上把高等教育培养的任务仅仅局限为培养“国家干部”、“社会精英”。高等学校大都按照这种要求组织教育和教学活动，学生

及其家长也把这种目标看作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期望，以至于当前高校毕业生的出路总是无法扩展。

2、传统高等教育体制的束缚。我国传统高等教育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注重整齐划一是传统高等教育体制的显著特征，这种体制在精英教育阶段曾经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与大众化教育发展规律却不相符合。近年来，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虽然我国实行了一系列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和创新，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仍存在一定差距，体制性缺陷仍是当前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校定位的最大障碍，主要表现为：一是高等教育层次体系不太明晰。当前，我国对高等教育层次的划分并无明确规定，高等教育法只规定“高等教育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学历教育分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这种分类主要以学历为标准，且比较笼统，层次性不强。正是因为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分类标准，使高等学校无法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找准自身位置，进而影响高校自身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办学形式和培养目标等方面的定位。二是高等教育评估指标体系的单一性。我国现行评估指标体系是根据学术性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制订的，主要以科研规模的大小、论文与专著的数量以及被 SCI、EI 等收录数与 CSSCI 引文数、博士点与硕士点的多少，作为评分与排名的主要依据。评估指标就是指挥棒。单一的评估指标体系必然会使部分高校在办学中迷失方向，造成千校一面的现象。

3、高等学校在办学实践中存在的弊端。一是办学理念的趋同性。办学理念主要指一所学校要办成什么样的学校和怎么办学的问题，但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目前许多高校的办学理念不太明确，部分高校没有认真分析自身的任务、办学传统、办学风格，一味地追求“大而全”、“高而尖”，从而造成学科结构、发展方向、培养目标等方面趋同性。二是培养模式的单一性。进入大众化阶段，各类高等学校仍沿用精英阶段的统一人才标准作为培养目标，在这种培养目标的指导下，各级各类高等学校都按照精英教育式的学术标准来制订教育和教学计划，开展教育和教学活动，在培养方式、培养手段、培养内容等方面都大同小异，一些高职院校丢掉自己的职业性办普通教育，即使是专科层次的学校，很多也办成了压缩型本科教育。三是管理方式的一元化。“封闭式”管理仍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主流，把加强对学生的管理与使学生与社会相隔离等同起来，学校仍是神圣的“象牙塔”。同时，部分院校采用同样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要求来管理不同层次的学生，重管理轻引导的粗放型管理模式仍大有市场，如何及时根据社会和市场的人才需求动向来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是我国高等学校亟待研究的问题。

所谓高校定位就是各级各类高等学校根据自身的办学规模、师资水平、办学条件、学校性质和类别等情况，结合自身的办学思想、培养目标、发展方向以及与其他高校的关系等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找准适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位置。深入总结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认真审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际，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实现高校的准确定位，必须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制度，规范办学行为。

三、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高校定位的措施与对策

1、要坚持观念更新，以科学的高等教育观指导高校定位。

一是要全面正确地理解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内涵和价值，避免把高等教育大众化片面地理解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对精英教育的排斥。虽然精英教育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已成过去，但精英教育的思想并未衰竭，在大众化教育中精英教育仍可存在。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必然向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两个方向发展。二是要树立正确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在发挥着不同作用和承担着不同任务，我们不能以研究型大学的价值取向来衡量和评价其他类型和层次的高等学校，社会职能是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功能也是多样化的，只要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能

够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断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要求，就是优秀的。因此，我们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都应重视，不能厚此薄彼，在制度和政策的安排上要统筹考虑，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保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各个高校安于其位。三是要树立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要转变过去单一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改变以单一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等学校的办法，建立多维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不同的质量标准来评价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

2、要坚持制度创新，为高校定位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高等教育多样化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也是明确高校定位的关键。因此，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应以推进高等教育多样化为出发点，以构建多元化开放型高等教育体制为目标，而当前在高校定位问题上，加强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和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尤为迫切。

构建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体系，既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也要结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目前，国内外关于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划分标准和观点很多，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国际教育分类法》（1997年修订稿）是按照培养人才职能——培养目标把高等教育划分成二个阶段；二是美国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以学历层次为划分标准，把美国高等教育分为五个层次；三是武书连等在《中国大学评价》中以高校的科研与教学关系为标准将中国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四是潘懋元把中国高校分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专业性应用型大学或学院和职业性技能型高职院校。这四种划分标准和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均反映了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情况。但比较而言，潘懋元的分类观点更加符合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实际，一是此分类法是按高等学校培养出的人才的特色来划分的，这有利于指导我国高校在大众化阶段的正确定位，避免高等学校盲目追求“升级升格”；二是此分类法较好地体现了国家提出的“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强化了各类高校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

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以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形成为前提，只有形成了多层次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才能制订出不同的评估指标体系。同时，高校评估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应由多种子体系组成，要涵盖教学、学科、培养目标等内容，以有利于具体指导高等学校的定位，规范高等学校的办学行为。如美国就建立了较完善的高校评估制度，既有对一所学校全面的合格性评估，又有对高校的分类评估，并在同类学校中排出评估名次，还有研究生教育的分学科评估，在全美按学科评估排出名次。正是通过各种不同的评估制度，引导高校下功夫在本层次上提高质量，办出水平，形成特色。

3、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在办学实践中应定位准确，不越级、不客串。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各高等学校应根据自己的传统、资源、特色、优势和外部需求等方面实现科学的定位，不要盲目攀比拔高，要立足于本层次，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各司其职，各安其位，不断规范自己的办学行为。如在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目标上，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要加强对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高素质、高水平的拔尖创新人才；专业性应用型大学或院校要突出专业能力的培养，为各行各业输送高层次的专业人才；职业性技能型高职院校则重点是强化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以培养具有相关职业技能的，在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各种技术人员。在功能定位上，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一般拥有一流的科研人才和一流的科研设备，应当突出科研的功能，多做一些基础性研究，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发挥在发展科学方面的主导性作用，同时，为了有利于科研人才的培养，这类高校应适当控制招生规模，以保证教育的质量。而其他层次的高校要突出教学的重点，要自觉承担起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科研方面要注重实用性，要服务和服从于人才的培养。当然，规范高校的内部活动，实现高校的自主定位是一项复杂工程，

涉及面广，它还包括学科结构、管理模式、办学理念等方面，限于篇幅，不一一展开。但必须指出的是，就一所高校而言，定位是制定长远发展规划的逻辑起点，是区别于其他高校的标志性特征，是学校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能动反映，是其办学理念、人才培养质量、管理水平、社会声誉与地位的最直观的反映。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各类高校要审时度势，认真分析自己的实际，积极主动地找准自身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唯有如此，各类高校才能在大众化潮流中健康发展；也唯有如此，才能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人大复印资料 2005, (5)

“地区一流”院校的定位与发展策略

邹晓平 东莞理工大学副校长

按照 2000 版卡耐基高等教育分类，在全美 3941 所院校中，有 15 个以上学科，每年毕业超过 50 名博士的大学 261 所，占 6.6%。即使这些大学也不都是世界一流，因为至少在中国，“世界一流”是指若干个学科学术研究水平的世界领先。而另外的 94% 中也不乏一流院校。“对大学而言，成为国家一流或者地区一流是同等重要的”，“即使最好的大学也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对于以精英和大众为两极加速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仅追求世界一流是不够的，1552 所普通院校(2004 年 5 月 27 日教育部统计公报)中至少有 1500 所是为竞争“地区一流”设立的。“高等教育的精力和资源要聚集在更为现实和可能更为实用的目标上。”没有一大批地区一流院校推动区域社会的全面进步，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是空中楼阁，即使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产生了也不可能持久。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当务之急，中国需要建设更多的地区一流院校。

—

首先应该为“地区一流”院校定位。

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正在发生明显的多样化变化。满足这些需要，高等教育从办学理念到教学过程都需要多样化，高等教育服务的各个区域和类别中都需要有一流院校。

克拉克·科尔认为，“一个社会至少应该具备三种类型的高等学校”。一是“X 模式”，学校的中心主题是学问，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在国家或国际水平上运作。二是“Y 模式”，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社会职业需要对本科生进行专业训练和普通教育素质培养，在国家或地区水平上运作。三是“Z 模式”，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社会的任何需要和顾客的选择，培养实用性人才，在地区或地方水平上运作。追求地区一流的院校，属于 Y 或 Z 模式。

从办学理念分析，“地区一流”院校，需要来自院校服务区域政府、企业、民众的广泛参与，而不仅仅是“校长的办学理念”。

从办学模式分析，“地区一流”院校应该注重教学资源的国际化，服务面向的区域化，必须有自己的开掘与创造。无论是传承与创造哪一类知识，都需要有自己独特的办学模式，目标是使绝大多数当地居民能以他们方便的学习方式，在他们一生的各个阶段，在学院找到他们所需要学习的任何知识。精英教育所不屑一顾的灵活的学习方式，非常实用而不够理论深度的教学内容，按学生需要选择而不是按知识系统的教学方法，重在实践应用能力而不是知识熟练程度的评价指标等等，只要民众需要，地方院校就应该提供。

从人才培养目标分析，按照著名学者潘懋元先生两个体系的划分，地区一流大学从事的不是精英教育，而是大众教育；主要不是为了更高层次教育的生源选拔，而是为了满足社会“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的需要，满足受教育者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需要。“地区一流”院校应该建立适应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学科结构和技术水平，适应地方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服务模式，在培养具有技术专才的高素质公民而不是学术精英上创造一流；在服务地方而不刻意追求在基础研究方面创造一流；在传承、选择、交流、整合地方文化方面创造一流。

从评价机制分析，“地区一流”只能是一种适应性评价，一种目标适切性的评价，一种社会评价。受教育者对知识、能力的增长是否满意，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社会，院校服务地区的效果能否满足社会需要，是否达到投资者的目标，是否符合主办者的要求，这些是评价地方院校办学者的主要方面。

一

“地区一流”不是“世界一流”的预备队。

“世界一流”是以学术水平为共性的最优；“地区一流”是以服务地方为特色的最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个功能、一个目标下的地区一流，并不表示若干年后能取得在其他功能、其他目标下的一流；同样，世界一流也很可能不足以成为“地区一流”。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学轻术，没有几所院校愿意声称自己的发展目标是“地区一流”。然而，现代商业文化重术轻学。为了经济的发展是地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学习“有用”的知识是很多学生求学的主要目的。倡导“地区一流”，就是要推进从办学理念到教学过程，从人才培养目标到社会服务方式的多样化。地方院校既可以是侧重效率的，也可以是侧重公平的；既可以是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定制的，也可以是为了某些非学术方面选拔优秀的；既是政府政策主导的，又是市场推动的。

发展地区一流院校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必需。在接受高等教育逐步成为大众民主权利的时代，保护精英教育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扩张和提升大众教育。如果我们让地方院校始终作为精英教育淘汰者的出口，地方院校总是作为一个较低的层次，而不是作为社会急需的另一个类别存在，其结果首先是压抑和损害了大众教育。正如今天我们所见，相当多的地方院校，尤其是职业技术学院，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很低，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很低，数以十万计的上线考生一年又一年的复读，为的只是挤入精英教育行列。因而，精英教育不得不在政府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下高速扩张，追赶世界一流的大学人满为患，教育资源十分紧张，快餐式课程在精英教育的课表上比比皆是，麦当劳式、超级市场式的教学管理在研究型大学里成为革新招，商业文化在学术重地过度张扬，精英教育正在被消解。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如果没有众多的地区一流院校就不会有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二

建设“地区一流”院校必须建立合理的地方院校治理结构。

用精英教育的管理模式管理所有院校，就会使得各院校趋同和平庸。由地级市或以下政府举办的院校，建设地区一流，在法律地位和管理机制上存在不少急需解决的问题。法律规定中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国家和省两级办学，城市政府没有举办和管理高等学校职责，地

方院校与地方政府失去了法律联系，市级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无法整合并统一规划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地方院校难以融入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解决的办法是应当制定政策或法规，明确将举办和管理地方高等学校作为城市政府的职责，并规范地方政府和所属院校的权力与职责，地方院校实行法律框架内的属地管理。

从校本管理的角度，地方院校比之从事精英教育、追赶世界一流的大学至少有三点显著不同：一是学校与社会间的界限模糊，社会公众、主要利益团体、地方政府都需要介入大学发展决策；二是学校内部管理的民主参与，不仅包括教授，也包括初级工作人员、学生；三是管理模式、目标、过程的多样化，评价指标既有学术标准，也有非学术标准。

在实际工作中，至今仍然有相当多的地方院校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学生的大学、社会的大学、地方的大学，而仅仅将自己看成是校内教职员的大学、教师的大学、教授的大学。校长由上级政府部门任命，只在校内接受考评，决策机构事实上只对校内负责，缺少校外人士的声音，院校服务地方的决策机制缺失。地方院校被传统文化的惯性推向精英教育也就不足为奇了。解决的办法是，地方院校发展战略决策社会化，发展目标评估地方化，由政府、地区主要利益团体、大学共同决定办一所什么样的地方院校。

地区一流院校必须有与世界一流大学不同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机制。学术权力由下而上，让学校系、所拥有实质性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由外而内，由上而下，顶部主导，可能是多数地方院校在追求“地区一流”的进程中适合采用的一种权力结构。

大学是历史的，更是现时的，大学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不必担心多样化的、面向市场的开放的、一心一意服务地方或社区的地区一流院校会使大学不像大学。以国家的力量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以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力量建设一大批地区一流院校是中国高等教育两个成败相依的战略目标。

——摘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

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

刘尧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

在 2004 年 8 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忧虑的说，中国“现在的大学，喊出的口号都一样，‘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重点大学都这么提；很多学校盲目攀比，追求高、大、全，中专改大专，大专改大学，大学有了本科招硕士。有了硕士招博士，有了博士办博士后流动站；所有的‘学院’都要改名变成‘大学’；所有的学校都是知名大学，都向学术型转变，千校一面的趋同化倾向令人担忧。”纪宝成认为，政府、社会的导向，以及各种有失偏颇的评价体系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演化，而并非鼓励大学办出特色。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说：“一种模式，都往综合化发展，都不断扩大规模。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最终将使很多学校丧失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许多大学校长呼吁：大学要办出特色！无论在建设一流大学进程中，还是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战略中，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处在一个焦点上。因为大学与大学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可以量化的实力上，更表现在不可量化的特色上。

一、何谓大学特色

大学特色有共性与个性之分，共性是指大学区别于非大学的其他社会部门的独有特征，体现大学的本质属性。具体说，大学区别于非大学的其他社会部门的显著特征是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融为一体。个性是指一所大学区别于其他大学的独有特征，体现一所大学的专有性或显著性发展方式。本文所研究的大学特色是指大学的个性特色。

大学特色是指一所大学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比较持久稳定的专有性或显著性发展方式和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良的显著特征，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是一所大学的优势所在。大学特色具备独特性、稳定性、持久性和发展性。独特性指一所大学的特色是有鲜明个性的，亦即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稳定性和持久性指一所大学的特色是在长期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并被社会广泛认同；发展性指一所大学的特色是与一所大学的发展相伴随的，是不断提升、不断丰富和不断发展的，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性。

大学特色是一个集合概念，反映的是学校各方面工作特色的集合。一般来说，一所大学的特色主要由物质形态、组织形态、观念(精神)形态三个部分的许多方面构成。大学积极发展各方面的特色，应该是大学特色追求上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大学特色的作用力产生于各方面各种具体特色的作用力所形成的合力：大学目标的特色产生导向力；大学学科的特色产生生长力；大学模式的特色产生发展力；大学环境的特色产生吸引力；大学校长的特色产生感召力；大学教师的特色产生影响力；大学学生的特色产生竞争力。努力形成与发展大学特色，是我国大学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努力奋斗的目标之一。大学特色的灵魂是具有适应国家、社会发展的大学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大学特色的表现在一所大学专有而显著的发展方式，比如与众不同的校风、学风、师资水平、学科专业、制度规范、教学与研究方式；大学特色的目标是以服务社会发展为宗旨，创造领先的科研成果，培养出有独特个性和丰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大学特色的价值取决于大学对科学和社会发展做出的、被社会广泛承认的实际贡献。

二、大学特色：大学生命力和竞争力之所在

综观当今世界著名学府，它们的确是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越是著名的大学，就越有自己的特色。哈佛大学是培养政治家的摇篮，麻省理工学院出工程师，剑桥大学的物理学科名扬天下，牛津大学的数学学科举世公认。世界上一流顶尖的大学均以鲜明的特色，在国际大学之林中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牛津大学在 800 余年发展中，以 19 世纪以前的“牛津学究”为载体，形成了献身上帝、献身学术的精神，以及求实、辩证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耶鲁大学以“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为教育理念，实施教育目的多重性和坚持人文主义精神及“自由教育”原则。麻省理工学院以“理工与人文相通，博学与专精兼取，教学与实践并重”为教育理念。芝加哥大学以“研究工作是学校的主要工作”为办学方针。坚持以“哈珀计划”为代表的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北大提倡“兼容并包”，有“民主”、“自由”之风；清华提倡“厚德载物”，有“严谨”、“认真”之风；南开提倡“允公允能”，有“开拓”、“活泼”之风。有人说，如果清华似少林，北大似武当，那么复旦就似峨嵋了。清华人技压四座，北大人光彩照人，而复旦人总能以细腻敏捷取胜。这些都从某个方面反映了他们各有的特色，都是他们自身特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学特色是大学独特的、持久的内涵。有特色的大学，才是有魅力的大学，也才是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大学。就全国而言，大学走特色化发展之路，才能形成大学间的相互协作共生的良性发展局面。一所大学的特色愈鲜明，其与其他大学的协作互补作用便愈强，也就愈容易产生出特色化的高等教育和培养出特色化的高级专门人才，而这些又反过来进一步提升和丰富了这所大学的特色。但是，在我国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我国大学一直存在着

盲目模仿的通病——大学的发展不是在大学的特色上做文章。而是追求高、大、全，盲目升格，所有的学院都要改成大学，所有的大学都要向学术型转变。大学的个性特色丧失殆尽，特色大学一天天在高等教育中淡化和消失，大学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就会葬送在盲目模仿中。我国大学“同质化”严重，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国内外专家的普遍看法。“大学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办出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服务与质量的特殊性。”伯顿·克拉克说；“当普遍的不景气发生时，没有特色的院校除在经费预算中的固定位置外，对资源没有特殊的权利。作为一个可与其他院校相互代替的院校，可能被负责削减预算的官员选作多余的单位动大手术或破产拍卖。各种各样的公共当局更可能试图褒奖那些想办出特色的院校，而不是安于故常的院校。有许多理由促使胆怯的公共院校回避在象征方面平淡无奇，而是力争表明在特定的品质和服务方面和与外部支持群体的关系方面的独特性。”我国学者也普遍认为，特色是大学生存的前提，没有特色的大学常常会处于危险之中。这些看法虽然是把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作为工具理性和生存战略对待，但在竞争中首先是求生存，所以这是正常的和无可厚非的。然而，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大学的生存只是前提，不是目的。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不可急功近利，大学要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不是可以靠短期行为一蹴而就的，它不是大学面临生存危机时可以呼之即来的救命稻草。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可以作为大学求生存和规避危机的重要手段，但从根本上讲，大学首先应将它作为价值理性和发展战略来对待。

三、大学特色的历史性与时代性

英国著名学者阿什比曾经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民族与文化背景，造就了风格迥异的大学。中世纪欧洲的意大利的波伦亚和法国巴黎大学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当时保存和传承人类知识是大学的主要职能。培养人才是大学的主要任务。当这种以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的大学传入英国之后，受到洛克绅士教育的影响，形成了以注重贵族心智的培养和性格的养成为主要特征的博雅教育，牛津、剑桥传统因此成为古典大学特色的突出代表。19世纪初，德国在洪堡的倡导下创立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关于“大学应当同时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办学思想，把大学由传统的单纯人才培养的一元职能变为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并重的二元职能，使柏林大学被公认是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最早大学。19世纪中后期，当美国把这种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大学移植到美国本土后，继承了德国科学民主的办学思想，重视大学的科学的研究，由此形成了以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一类研究型大学，然而受美国实用主义及功利主义哲学深刻影响的美国人，并不满足于这种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大学，而把实用性人才与直接为社会服务摆在大学发展的首要位置。其中创建于1848年的威斯康星大学，把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联在一起。突破了以往大学二元职能结构模式，把大学从社会的边缘推向社会的中心，由此威斯康星大学成为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典范和旗舰。所以，就文化交流而言。世界高等教育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民族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并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特色的大学。换言之，只有与本民族历史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大学，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大学特色。为世界高等教育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人才，传播和创造科学与文化。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哈佛大学(1636年建校)，最初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让他们的后代受到英国式的教育，为培养神职人员，满足教民们的需要而建立的。但哈佛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加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并适应社会需要改革课程设置，坚持独立、自由、合作的办学三原则，才使该校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半叶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哈佛特色的形成最为宝贵的经验，就是紧跟时代变化的步伐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锐意改革，以领导教育改革的潮流。其他如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剑桥等办学极有特色的大学，其特色无不充分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

四、大学特色的多重性与多元发展

众所周知，成熟的大学特色是鲜明、丰富和稳定的。这其中的“丰富”二字，即指大学特色具有多重性或多元性特征。就一所大学来说，可以同时在物质形态、组织形态、观念(精神)形态诸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专有性或显著性。大学特色的多重性或多元化发展，既能为国家培养个性鲜明的高级专门人才，又能为大学自身持续稳定发展创造条件。这是因为，在大学多重或多元特色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在长期的互动和互补中形成一种有机的组合。这种组合本身又是一种特定的(或特色化的)、稳定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大学的任何一种特色都更为稳健。相反，特色单一化的大学，特别是凭借某一方面形成单一特色的大学，在高等教育市场大潮中却时兴时衰，波动很大，有的甚至一蹶不振。当然，大学的多重或多元特色，不一定具有同等的市场价值和竞争优势。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学特色的市场价值和竞争优势，常常出现此起彼伏的现象。此时某一特色更受市场青睐，彼时另一特色更具市场诱惑力。特色多元化发展的大学，由于多元特色之间有相互弥补和相互牵动的作用，就不至于在市场竞争中丧失优势。

世界一流大学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普林斯顿不像哈佛，也不希望变成哈佛；反之，也不希望哈佛变成普林斯顿。就大学群体来说，大学的活力也在于多样化，在于相互补充、相互竞争。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一流大学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全，关键在有特色，并把特色发挥到极致”。世界一流大学中，有特大、特全的，比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但也有美国加州理工这样只有 2000 名学生的小型学校，还有像法国的高等师范学校和物理化学工业学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非常重视自己的特色。大学特色多元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大学自身的稳定发展上，还在于它对其他大学及社会发展的影响上。人们常常看到，特色多元化发展的大学，不仅对大学内部的凝聚力要远远大于特色单一化发展的大学，而且对其他大学及社会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也要远远大于特色单一化发展的大学，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张扬大学特色的独特性的同时，也绝不能忘记张扬大学特色的丰富性、多元性。只有当大学具有独特而丰富的特色时，才能更具影响力、生命力和竞争力。

五、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结合

独特而丰富的大学特色是如何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缘由。中外大学发展史表明，现代大学起源于传统的古典大学，即农业时代的大学。在农业时代，大学是一个自由组织。它没有预设的发展目标，没有政府的强制推进，只有因自由选择而形成的特色。工业时代，工业资源集聚和高效率生产促使大学发展进入了大众化时期。农业时代自由发展而形成的大学特色，在这一阶段演化为大学的“同质化”发展，大学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人们用工业化的思维建设和发展大学，大学由自由的演进过程变成了快速发展的过程，由特色化的成长变为“同质化”的发展。信息时代的出现，信息的高度密集与高速传播，使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也使大学国际化、现代化成为必然；同时信息的快速交流，促使大学发展走兼容并包之路。新的大学理念提出，大学应成为多元文化碰撞和冲击的人类文化的交流中心。现代大学一方面在兼容并包中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发掘和展示自身的特色。

大学是有目的系统，大学特色不可能自然形成，必须在正确的办学思想指导下，经过大学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共同努力，长期不懈的追求和积累，才能逐步完善，因此，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既要保持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又要大胆拓展和创新。就是说，大学特色既不能完全任其自由发展，又不能仓促“打造”，只能积极地形成与发展。其一，必须摈弃盲目模仿的陋习。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千校一面”的尴尬局面。有些大学不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发展的需要，进行富有特色的大学规划，而是模仿其他大学。大学发展不是在特色上做文章，而是在“大”与“全”上相互攀比。其二，必须注重保持大学的历史文化传统。大

学的内在支撑点主要在于其特殊的历史文化，离开大学的历史文化，大学特色就无从谈起。其实，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是从过去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走来的。

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还必须注意从物质形态、组织形态和观念(精神)形态的结合上继承和创新。一是要处理好大学特色的物质形态、组织形态与观念(精神)形态的关系。大学特色的物质形态、组织形态和观念(精神)形态应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大学特色不仅表现在外在的物质和组织形态上，而且更内在地表现在大学的观念(精神)形态中。实践和事实证明，只有这样的大学特色，才能赋予大学各种外在物质和组织形态以内在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而且这样的大学特色，愈是源远流长，其大学的内在生命力与竞争力愈加持久和强烈。通过它，不仅可以看一个大学的容貌和神韵，感受到一个大学的底蕴和历程，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大学特色，能够极大地促进大学的发展，优化大学环境，提高大学品位，增强大学的创造力、吸引力和辐射力。二是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大学特色这个系统中，继承与创新是相互依存的。没有继承，就没有根基；没有创新，就没有了大学的生机与活力，没有了大学的未来和希望。我们说大学特色要保持大学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不意味着把历史的东西，不分良莠，全盘托出，而是要在继承中扬弃，在继承和扬弃中拓展与创新。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是对大学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我们在强调继承大学历史文化传统的时候，并不排斥对现代先进大学文化的吸收。否则，这种大学特色就会变成封闭僵化的古董。应当说，一所大学的特色，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和未来的。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既要重视大学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又要不断开拓创新。

—————摘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

◆高教改革◆

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

近些年来，面对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全球性的经济、军事、政治竞争、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对策，人们把目光投向教育，把希望寄托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未来人才培养上。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改革正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态势。

高等教育结构的多样化

高等教育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从单一结构向多种结构演化，这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态势之一。现代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国对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不仅需要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而且需要大批中级技术人才。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建立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合理的人才结构，改革传统高等教育象牙塔式的结构，实现教育结构类型的多样化。这具体表现为多种形式办学，除扩充原有的大学外，大力发

制不同的短期大学和初级学院，使各类高等学校并存，培养目标互异和教学方法灵活多样。

从世界上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结构层次来看，研究生、本科、专科这三个层次呈金字塔形，其中的短期大学和初级学院近几年来尤为受到重视，并获得了很大发展。如目前美国的初级学院或社区学院已发展到 1500 多所，学生注册人数达 650 万，约占全美大学生总数的 50% 以上，是当今美国高等教育中发展最快的学校。德国的初级技术大学发展也很快，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目前德国共有 850 所初级技术大学，占其高等学校总数的一半左右。日本的短期大学从 1980 年的 270 所、在校生 30 万人，增加到 1994 年的 625 所、在校生 190 万人。由于各国短期大学和初级学院都以培养目标明确、学制短、收费低、区域性强、就业容易而见长，因而颇受各企业生产部门和人才劳务市场的欢迎，促进了其自身的规模和数量的迅速发展。

高等教育课程的综合化

现代科技与生产的发展，是以综合化为基本特征的，反映到高等教育中就是课程的综合化。所谓课程的综合化，就是使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相互渗透、交叉进行，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具有解决复杂课题的技能。当今，高等教育课程的综合化已为许多国家所重视，由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高等教育在课程改革方面已收到了显著成效。

近年来，美国主要是以政府法令形式将课程的综合化确立下来的。1991 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发展高等教育和提高专门人才质量方案》。该方案认为：“加强专门人才在生产和科技部门独立工作的能力，是当前高等教育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基本方针。”为此，“要求在课程改革上，打破原有的课程界限及框架，实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创设新型的综合课程。”比如，在工程教育方面，美国不少大学都注重工程对社会的服务，利用工程理论解决现代都市管理和建设问题，保护环境，发展经济，从而使工程教育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建立起以往从未有过的密切联系，导致许多新兴边缘综合性课程的产生。例如，环境工程学、地震工程学、交通工程学、商业工程学、教育工程学等等。这类课程突破了传统专业领域的局限其内容是多学科综合性的。

日本筑波大学把综合科学纳入教学计划，重新组织课程内容，以加强课程的综合性，这已引起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关注。现在，日本其他大学也纷纷仿效，大搞课程综合化的改革。

高等教育的科研、教学、生产一体化

科研、教学、生产一体化，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科学和经济综合发展的产物。从宏观上看，建立以高等教育为主导的、同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的联合体，将是世界各国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共同模式，它的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新技术革命和现代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反映了科学理论对新技术的指导作用以及科技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大学人才荟萃，智力密集，最能产生新知识、开发新技术，与企业合作就可以把大学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新兴产业的建立、新技术的开发，都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天，高等教育必须面向现实社会经济，并服务于现代社会经济，这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趋势。

当今，许多国家都积极致力于这方面的改革实践，把大学作为主要依托，建立以大学轴心的教学、科研和生产联合体。美国在波士顿地区和加州地区形成的高教、科研和生产结合体系，就是两个成功的例子。一个是波士顿地区，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的帮助下，从一个以传统工业为主的地区一跃成为“科学工业综合体”地区；另一个是加州地区，在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的帮助下，由 100 多年前的荒芜之地，一跃而成为闻名全球的“硅谷”电子工业基地。韩国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向集约化

方向发展，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得到进一步发展。仅以“大田科技工业园区”为例，那里建立了38个联合体，其中有21所大学，13个研究所和设计局、80多家生产企业、100多个实验和生产车间。其他国家，如日本的“产学合作制”、瑞典的“工学交流中心”、英国的“科学公园”等，都体现了同样的发展战略。

高等教育协作的国际化

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尤其是通讯、信息、航天技术的发展，大大缩短了各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加强了在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诸方面的联系。同时，各国的教育都是国际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都面临激烈竞争。所以，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几乎无一例外地以面向世界为前提，使本国的高等教育向国际开放，以促进学术、文化和教育的交流和协作。这主要体现在交流办学经验、交换情报资料、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和合作研究与开发项目、交换学者和互派留学生等方面。

日本为加强高等教育协作的国际化，以培养富有“国际性的日本人”，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用来改革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例如，日本把留学生政策摆到文教和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一方面实施了多种公费留学生派遣制度，以便在招收和派遣留学生方面，到21世纪不亚于欧美各国；另一方面为自费留学生提供便利条件，扩大自费留学生的数量。此外，日本政府为提高本国高等教育质量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积极参与国际机构组织的多国科技开发和研究合作活动。近年来，日本首先同美国签订了“日美科技合作项目计划”，就核聚变、太阳能转换、高能物理、宇宙空间等领域进行合作研究和开发。日本还与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中国等进行了一系列合作研究项目。美国素来重视利用自己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吸引外籍教师和学生。不同国籍的教授汇聚在美国许多名牌大学中执教和从事研究工作，世界各国的许多青年纷纷到美国留学，这数十万外国学生给美国带来了各民族最优秀的东西以及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些足以引起西欧各国的羡慕。可见，高等教育协作已进入国际化的新时期。

高等教育宗旨的终生化

迅速多变的现代科技和生产，对社会在职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不但要具备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且还要具备合理的智力结构和不断更新的知识结构。能否使在职人员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的新型社会生产者，已成为各国迎接跨世纪挑战的关键所在。为此，很多国家均把终生教育理论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宗旨。

德国政府在1993年的《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中，专列一章，要求“加强高等教育在专门人才的进修和再培训中的功能及作用”，主张“应当把大学看作终生教育机构的基础机构，”号召“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适应科技信息化的发展，将大学改革和调整成为社会在职人员可以继续学习和深造的场所”。目前，除了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外，国际上建立较为完善的终生教育进修系统的国家尚不多，而国际上较为盛行的做法是充分发挥大学的优势来进行社会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以达到终生教育的目的。国外一些著名大学，像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丰桥科技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法国的法兰西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都承担着为国家或企业培训在职人员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家已把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和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一起列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三大组成部分，这将使社会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产生新的飞跃。现代高等教育，无论在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方面，还是在大学后的继续教育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自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思路与未来展望

——解读《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方案（试行）》

上海交通大学 金 艳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六级考试改革项目组和考试委员会在教育部高教司的指导下，制定了《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方案（试行）》。本文将全面阐述改革方案的设计思路和对四、六级考试未来的展望。

一、四、六级考试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由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种检测手段，同时也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环节，因此改进其对教学的后效，即考试的反拨作用，是本次考试改革的重点。也就是说，四、六级考试改革的方向是在保持考试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同时，使考试最大限度地对大学英语教学产生正面的导向作用，即通过改革，进一步引导师生正确处理教学与考试的关系，更合理地使用四、六级考试，使考试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新的社会需求对大学生的英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能通过阅读来获取信息，还能以英语为工具，参与学术交流活动，如听学术报告、参加学术讨论等。为此，教育部于2003年初成立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项目组，制定了新的《教学要求》，提出了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目标，即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

因此，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将对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进行改革，目标是更准确地测量我国在校大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尤其是英语听说能力，以体现社会改革开放对我国大学生英语能力的要求。

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近期改革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近期改革的首要任务是通过计分体制和成绩报导方式的改革，引导广大师生和学校行政部门合理使用四、六级考试；其次，通过所测能力结构和题型的调整，进一步推动各校朝《教学要求》所规定的教学目标努力，使教师和学生更加重视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

1、改革计分体制和成绩报导方式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所需人才的英语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也随着四、六级考试逐步被社会认可，四、六级考试的使用渐渐超出了最初设计者所预期的教学考试范围，社会权重不断增加，考试规模不断扩大，随之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四、六级考试证书与学生毕业或学位不合理地挂钩、应试教育、作弊违纪等。因此，考试的改革首先必须考虑如何使考试结果的使用更加合理。为此，近期将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改革四、六级考试计分体制和成绩报导方式。

目前每次四、六级考试的分数经过数据处理后，报导均值为72，标准差为12、总分为100的正态分，并发合格（定为60分）和优秀（定为85分）证书。自2005年6月考试起，四、六级考试的分数在经过加权、等值、正态化数据处理后，将报导均值为500、标准差为70、成绩全距在290分至710分之间的正态分。

为改变以简单的考试通过率来评价教学或学生能力的现状，四、六级考试将不设及格线，考试合格证书将改为成绩单，即考后向每位考生发成绩单，报导其总分和各部分的单项分。这样，教师可以更充分地了解教学的长处和短处，学生也可了解自己语言能力上的

强项和弱项。为使学校理解考试分数的含义，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将向学校提供四、六级考试分数的解释。

四、六级考试历年来的数据表明，全国大学生英语能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学校的办学条件不同，生源条件不同，教学目标不同，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差异很大，因此，我们期望四、六级考试的计分体制和成绩报导方式改革后，学校对学生的英语能力要求不再是一刀切，而是根据各校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的教学要求，甚至可以对不同专业的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提出不同的要求，以利于教学行政部门作出合理的教学安排。

2、调整所测试的语言能力结构

在考试内容方面，近期改革的重点是听力理解部分。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对大学生的英语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教学要求》明确提出要加强听说能力的培养。具体体现在四、六级考试改革方案中就是加大听力理解部分的题量和比例。听力理解部分题量从 20 题增加到 35 题，比例从 20% 提高到 3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阅读能力不重要了，而是我们对听力理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听力理解部分的改革外，阅读理解部分和词汇部分也作了相应的调整。阅读部分比例调整为 35%，除原有的仔细阅读外，新增了对快速阅读技能的测试；原四、六级考试中的单句词汇理解和语法结构题改为篇章语境中的词汇理解测试，作为仔细阅读的一部分。

试点的四、六级考试由四部分构成：听力理解、阅读理解、综合测试和写作测试。听力理解的 35% 中，听力对话占 15%，听力短文占 20%。听力对话采用选择题，包括短对话和长对话的听力理解，其中长对话是新增加的测试内容；听力短文采用两种题型：短文听写（复合式听写）和选择题；听力题材选用对话、讲座、广播电视节目等更具真实性的材料。阅读理解的 35% 中，仔细阅读占 25%，题型采用选择题；快速阅读部分占 10%，采用是非判断题、句子填空或其他题型。综合测试比例为 15%，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完型填空或改错，即每次考试两者选一，占 10%；第二部分为篇章简短问答或句子翻译（中译英），也是每次考试两者选一，占 5%。写作能力测试部分比例不变，仍为 15%，体裁包括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等。表 1 和表 2 分别是现行的和将试点的四、六级考试各部分测试内容、题型和所占整卷的比例。

现行的四、六级考试各部分测试内容、题型和所占比例

试卷构成	测试内容		测试题型	比例
第一部分：听力理解	听力对话	短对话	多项选择	20%
	听力短文 (两者选一)	短文理解 或 短文听写	多项选择 复合式听写	
第二部分：阅读理解	篇章阅读理解		多项选择	40%
第三部分：词汇与结构	单句词汇理解和语法结构		多项选择	15%
第四部分：综合测试	四者选一：完型填空 或 改错 或 篇章问答 或 翻译		多项选择 错误辨认并改正 简短回答 英译中	10%
第五部分：写作	写作		短文写作	15%

试点的四、六级考试各部分测试内容、题型和所占比例

试卷构成	测试内容		测试题型	比例
第一部分：听力理解	听力对话	短对话	多项选择	35%
		长对话	多项选择	
	听力短文	短文理解	多项选择	
		短文听写	复合式听写	
第二部分：阅读理解	仔细阅读理解	篇章阅读理解	多项选择	35%
		篇章词汇理解	选词填空	
	快速阅读理解		是非判断+句子填空或其他	
第三部分：综合测试	两者选一：完型填空 或		多项选择	15%
	改错		错误辨认并改正	
	两者选一：篇章问答 或		简短回答	
	句子翻译		中译英	
第四部分：写作	写作		短文写作	15%

3、测试题型上的改革

根据以上试卷设计（表 2）可以看出，四、六级考试的题型也有所改革。非选择性试题的比例将增加到 35% 至 45%。非选择性试题指的是听力部分的复合式听写、快速阅读部分的句子填空、综合测试部分的改错、简短问答或句子翻译以及写作。

以上是四、六级考试笔试部分的近期改革方案。近期内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口语考试仍将与笔试分开进行，继续实施面试型四、六级口语考试（CET-SET）。四、六级口语考试的研究开始于 90 年代中期，经过长达四年的理论研究和试点，考委会于 1999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口语考试。五年来，四、六级口语考试的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在全国 36 个省会城市共设立了 51 个口语考点，每年参加考试的人数已近十万。

4. 近期改革工作进程

四级考试从 2006 年 1 月开始试点，六级考试试点从 2006 年 6 月开始。参加试点考试的对象是 180 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院校的部分学生。在试点过程中，考委会将根据《教学要求》建立四、六级考试新常模、制订新的四、六级考试大纲、完成新的考试样题，并将及时向教师和学生公布。全面实施改革后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时间暂定为 2007 年 1 月，六级考试为 2007 年 6 月。

三、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未来展望

任何一项大规模标准化考试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四、六级考试 17 年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金艳 2004）。国家改革开放对我国大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考试的中长期改革任务仍十分艰巨。概括来说，四、六级考试中长期改革的重点是加强标准化考试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完善四、六级考试系列；跟踪考试改革进程，研究四、六级考试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后效；开发利用高科技，实现考试实施和考务管理的现代化。

——摘自《中国大学教学》 2005, 5

上海高校：“教授”职称变职务

上海市人事局 2004 年 9 月 13 日宣布：上海市在高等院校全面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停止职称评审。“教授”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只是职务，不再是“职称”，离开了岗位就不能再称为“教授”。这是以岗位聘任为突破口，推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形成由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由资格评审转向岗位聘任，由论资排辈转向竞争激励，由指标控制转向结构比例制约的新型人才机制。

——摘自《世界教育信息》2005, 1

■学术争鸣■

过去教授的精神气质与现在教授的“身份危机”

黄俊伟

从现在的教授贬值说起

今日教授的精神气质和专业水准较之过去的教授，在社会权威、信任度等方面的“正面得分”明显偏低。教授的精神气质也可理解为是其形成自己专业能力所必须具备的“人格品质”。当这种人格品质面向公共社会领域时，能够展示其揭示、分析公共问题所蕴含的专业内涵，同时以大众知悉的表述方式介入公共话语。一定意义上讲，教授社会权威地位的支撑点，不仅要看他们是否是专业规范的立法者，还要看他们能否跨越其专业领域，并在专业与公共之间寻找一个自然融合的关联点，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公共规范的立法者、护法者，从而解释生活、申诉正义、张扬民主，履行教授的社会责任。

过去教授的精神气质

一是首先视学问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惟一支撑。大学教授受尊重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教授具有超过常人的专业知识。教授存在的最基本前提和条件，是首先要再科学上做出贡献。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美誉的李方桂先生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严重失衡，使现在的教授很难在官位利益诱惑前发出“我是一等人才”的豪言壮语——哪怕你确实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然，官本位体制下，也难以造就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品质的教授。

二是教授的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抗日战争时成立的西南联大，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由于政教相对分离的办学模式，保证了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学术本位的文化生存空间，使

这所“战时高校”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苏步青、华罗庚、李四光、吴大猷、朱自清、闻一多、马寅初、徐悲鸿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成为当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

三是教授身上极强的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即指在尊重人、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精神。于公共方面，过去的教授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是主持社会公平公正的代表，他们能就社会问题所蕴藏的专业内涵进行准确的理性判断，同时以“专业良知”的通观能力、思辨能力来影响公众甚至政府的价值行为取向，凸显教授的“士气”。

现在的教授出现“身份”危机的原因分析

现在的教授出现身份危机，无非有两层含意，一指其学术权威的“合法”地位呈令人置疑的状态，二指其公共道德影响力日趋式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曾昭奋先生于1994年参加清华校庆时，感叹：“四十多年清华出了很多大官，但是不出大学问家、大艺术家。”这种感叹是耐人寻味的。清华几十年都不出大科学家、大学者，奈何其他大学？这其实于侧面已说出现在教授身份危机的主要原因了。若细分，以下几点因素值得深究。

专业能力浅薄导致教授缺失学术权威地位，是现在教授普遍“边缘化”的核心原因。目前，由于教授职称是大学行政教育体制“提拔干部”的基本条件，不少人希望戴上教授头衔不是看重它的学术权威意义，而是试图通过教授作为“升迁平台”，以向行政方向转移工作重心。教授的学术研究若只是基于功利目的，或是视自己谋“仕进”、“待遇”的一种手段，必然使学术研究这一极为复杂的科学劳动、智力劳动异化为作秀式的“学术表演”。它至少已部分地成为了一些大学特权人士占据学术权力、学术地位、学术资源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工具与手段。

学仕一体导致学官与教授身份混同。经过“官本位”多年对教授队伍的渗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仕“一体化”已呈高度融合的状态了。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的现象，说明我们对教授的价值系统认定已呈倒错态势。大学教授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它的教育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而取决于其行为本身与行政系统权力价值的顺应度。虽然于表面上看，一些在教学、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教授往往被委以行政重任，似乎是看重他们的价值，但若从理性角度推敲，这恰恰是学问没有地位的证明。正因为从事纯学术研究的人的价值不被承认，所以才把他们“提拔”到行政、准行政的位置，在那里价值才被承认。一些在学术上极富才干，颇有造诣的年轻教授，为摆脱寂寞和受冷落的窘况，为享受“某级待遇”，只得调整“研究方向”跻身于官场。这种将教授纳入行政体制的人事安排，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是使他们首先渐渐失去专业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同时也自然相应失去了建立在专业能力基础上对于学校乃至社会问题的诊断能力及热情，变成只会说围绕行政组织原则大白话的“社会贤达”。

教授学术理念的物欲化，也使得高尚的学术研究于一些教授眼里，不再是钱锺书先生谓“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的地方了，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异化成赚取金钱和名利的手段，教授办公司、学者变商人成为中国的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目前非常普遍的现象。无疑，教授兼商人、学术商品化的结果，不仅把昔日庄重圣洁的学府变成钟情于开公司及举办各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凭班”之类轻浮的“学店”，也是导引当下学术腐败“蔚然成风”的原因之一。

结语：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准与世界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的根源是“官本位”

自清末新政改革教育，1901 年废除八股文，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至今已过了百多年。将这段历史粗分为两半，亦能清晰地看到，前半段尽管办大学的历史不长，条件也不好，但由于办学理念起点高，得益于遵循了政教分离、学术自由等国际上通用的大学办学惯例，因而造就培养了许多世界级的大师、大家，并在较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起了一批当时在亚洲乃至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如清华、北大、南开、交大、西南联大等。可以说，在中国诸多的教育遗产中，以办现代大学的成功经验遗产最具珍贵性。遗憾的是，中国大学后来的遭际正是抛弃了这笔珍贵的教育遗产，过去的学术本位被现在的官本位所取代，大学行政化，学术权力行政化，以行政权力为中心，权力意志一定程度上成为支配大学运作的基本要素。虽说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大、教授越来越多、连两院院士都已增至近一千七百人，然科技竞争力不升反降，1998 年中国科技竞争力排世界第十三位，2002 年却降至第二十五位。另据《亚洲周刊》2000 年对亚洲大学实力的排名，在综合大学方面，前四十一位无一所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而在工程类大学方面，中国内地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十五位，而印度理工学院竟有五所分院（印度理工学院成立于 1951 年，现设有七所同名分院，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分别进入前十强。当然，这些官方眼里的“民间机构”评估是否具有权威性、公正性，以及这些境外组织对中国是否存有偏见姑且不论，可结果本身至少说明一个令人非常忧心的事实：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准与世界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而恢复现在的大学教授建立在专业自信基础上的独立人格，关键是要遵循教育规律，营造学术本位和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学制度，以保证对教授学术成就的绝对尊敬要高于权力意志；其次则寄希望于教授们的道德自律。当然，依现时的国情，大学制度的真正改革并不完全取决于大学本身，它还依附于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

————摘自《书屋》2004 年第 5 期 原文 10000 字

教授 • 教学• 大学• 大爱 ——从李方桂先生谈起，兼谈大学问题

刘超 北大《学林》杂志主编

1940 年，中央研究院拟设立一个民族研究所，欲请这位“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执掌。而李方桂先生向来不屑于语言学之外的东西，“一不拜官，二不见记者”是出了名的，更别说请他当官做领导了。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门力邀，然李坚辞不就，实在不耐烦了，就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

才。”傅斯年听后，立即躬身给李方桂做了一个长揖，边退边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黄俊伟《过去教授的精神气质与现在教授的“身份危机”》，载《书屋》2004年第5期）

对李先生的此等高论，笔者不敢妄置一词，但以此为观照，回眸民国以降的某些情况，却不能不有些感受。在李公看来，“一等人才”做研究、“二等人才”事教学、“三等人才”搞行政，是不是符合当时实际呢？对此问题，只需对我国百余年的教育史做一回眸便可窥知一二。

一般认为，民国年间大学教育最为出彩的在这样几个时期：五四前后的北大，20年代的前期东南大学，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的清华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我们考察发现，上述诸时期乃至抗日边区的延安鲁艺，均有名家名教授上课甚至上大课的传统。李公所谓“二等人才”事教学的说法，此时恐怕与史无据。

可是，世易时移，白云苍狗，几十年之后的今日，高校却出现了一系列怪现状：本科教学中，有的教授不上大科甚至基本不上课，上大课的多是讲师；研究生培养中，教授只带博士生，而副教授才带硕士生。有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与教研人员不无关系。但根源的还是体制上的原因。平心而论，教授授课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部分时间，因此不可能对其科研全无影响。但是，总而言之还是有得有失，得大于失。鄙意以为，教授授课，其利如下：

其一，有利于教授之涵泳。教授在功底深厚思维深湛的同时，也未必就不形成“片面的深刻”，这种片面，易成某种思维定势，而初涉学术的莘莘学子，虽然道行尚浅、修为未逮，但却有其思维活跃的后发优势，因之也更具创新精神和锐气。这种趋新精神，或许有时可弥补教授抱残守成之倾向。因此，教授如能亲临教学第一线，无疑可以藉人之长补己之短，借年轻人的新鲜血液来更新自己，所谓“教学相长”是也。

退而言之，所谓教师，其旨在“教”，教授亦不例外。“教学”才是教师的本职工作，是其保持教职的基本底限，一个连职业规则都不遵从的人，何以为人师表？“研”而不“教”者可其做“学”者，做研究员（研究人员），但没有理由晋升教授（教师），没有理由占据日渐紧张的教职。一个充斥着“研”而不“教”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有多大差别呢？

事实上，“教”“研”关系，并非一个简单的工作安排问题，而涉及到一个大学的基本定位。西方的“研究型”大学并不因“研”而废“教”，反而是“教”“研”并举，尤重本科教学。杨福家先生指出，“大学”要有“大爱”，此言确然。“大学”之魂在“大爱”。“大爱”之“大”，也许并不限于学校对教师之“爱”，更应当涵盖教师对学生之“爱”。而教师对学生之爱，最好的表达莫过于躬身教学，培育英才。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爱”又从何谈起呢？

另方面，做学问固然应沉潜涵泳，应耐得住寂寞，但长期孤寂的书斋生活易使人心态枯涩、下笔枯槁，对人的视野和思维亦有其不利影响，易使治学者远离地气，缺乏鲜活的感性体验。长此以往，入得书中而难出书外，必致疏于世事，不仅于己不利，更谈不上知识分子应有的公共关怀。倘若教授能时不时到书斋之外走一走，特别是在青年学子中多走走，无疑有助于保持年青积极的心态和温润平和的心境，克服苍老心态与孤僻乖戾之气，也可在此过程中与学生分享快乐和教研心得，互相启发。——这又何弊之有？！

其二，有益于学生之培养。对一个问学伊始的学子而言，启蒙者的意义至关重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治学风格、研究理路，甚至对其学术品位、人格境界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年青学子在性格、才学等方面都尚未定型，因此最具可塑性，最是选“苗子”练“童子功”的关键时期。而此时，教师的意义不止于“授业”“解惑”，而且同样在于“传道”，那些极富历练、深具才学的名教授，其涵养、气度和胸襟，在耳濡目染中，对那些莘莘学子而言，具有何等的魅力，那是不言自明的。名师执教，献一己之力，育万千英才，不仅是“大

爱”，更是“大智”。

其三，有益于学风之营造和学统之传承。好学校可能有很多标准，办好学校也有很多途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是就重视人才，特别是名师。百余年来，举凡真有见识的校长，长校之初，第一件事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广延名师，蔡元培是这样、罗家伦是这样、梅贻琦是这样、胡适之是这样，傅斯年、竺可桢、王世杰也是这样。英雄亦需用武之地，而名师的“用武之地”当然莫好过于三尺讲台。大而言之，这有益于一所大学的学风的形成；小而言之，则是有益于学统的传承和人脉的酝酿。知识的积淀、学理的传承，有赖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前赴后续。

就个人而言，学人执教，可以最直接地把自己的知识、思想、心得、体会、体系传授给学生，这比纸面传授更直接、更逼真，也许还更有效。以民国为例，昔之王国维、陈寅恪同为学问大家，可是后来的景况就很不同。王氏身后颇为寂寞，而陈氏则相反。究其由，重要的一点是王氏素来重研究而疏教学，主要只是晚年在清华研究院供职，而陈氏青年时代即开始任教于各大名校，弟子甚多，学术传人也不在少，虽无真正多少意义上的嫡传弟子，私淑弟子却不在少数。当年授业于清华和联大时，已有教授“之教授”之誉，不用说常来听其课的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等名师，单是学生吴其昌、蒋天枢、钱钟书、周一良、王永兴、丁则良、许世瑛等等，而这些学生，也大都是人中龙凤，既有如此人气、气场和人脉，陈氏之学焉能不兴？比较二位大师生前身后之遭际，自当明了。

同样，上文所说的李方桂先生至今已是名之不闻、学之不传，恐怕也与其重“研”轻“教”不无关系。

其四，有益于大学精神的培养。联大的教育是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其在整体上基本模溯了此前清华的办学理念、精神和模式。关于联大，一般认为，其要有四，一是“大师办学”，二是“教授治校”，三是“通才教育”，四是“学术自由”，其实此外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名师执教”。所谓“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教授不仅要“治”一己之“学”，更要指导学生“治学”。名师可能不是道德完人，亦未必是学思全才，但至少有其独到之造诣。在大学体制中，作为个体的名师，其行止也许未必具备太大的实质意义（毋宁说是象征大于实际），但如果把名师授课（特别是给本科生上课）加以制度化，则意义至大至深。作为一个整体，大批名师亲执教鞭、传道授业解惑，得天下英才而以名师教育之，这样大学，必是生机活力的大学。惟其如此，空而又空、玄乎其玄的所谓“大学精神”，就已不再是止于某些纯粹的口舌义理之辩，而是落实为蓬勃的发展，是俊彦汇粹，是英才辈出的硕果。

总之，重视教学、特别是本科教学，教授授课、特别是名师给本科生授课，实是得大于失，不仅有利于教授自身的提高，也有益于学生，有利于学统之传承、学风之养成，而且有利于整个大学的建设。

对李方桂先生“人才论”，笔者不敢苟同。作为李先生的个人选择当然是无可厚非，但作为一种体制和制度而言，则不可大意。为大学的长远发展计，一流人才不仅可以搞研究、搞行政，更要亲临教学第一线。教学相长，师生并进，学风延绵，学统不绝。惟有如此，假以时日，大学才能重光昔日之辉煌，酝酿明日之奇迹。

——《世纪中国》网 2005-04-15 原文 8800 字

◆ 校长论坛◆

中外大学校长纵论我国高校建设四大热点

(2004-08-13)

施芳 溫紅彥

2004年8月4日到10日，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在北京举行。160位全球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聚集一堂，对我国高校建设中的热点问题怎么看呢？

关键词：大学排行榜

幽默观点：大学排名基本上没有意义，第三与第一的区别就是5000美元的区别

“中国大学排行榜”、“中国大学文科综合实力前十名”、“中国大学医学综合实力前十名”……

针对我国目前流行的种种大学排行榜，剑桥大学的理查德教授鲜明地亮出了观点：“一所大学的名声不是用排行榜‘排’出来的。我对给不同大学排名的方式非常反对。”理查德说，不同大学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每一所大学也都自有其发展的轨迹，无法将其粗略地进行对比。“每一所大学都有主攻的目标和基本的学术要求。不同国家大学发展所走过的路不尽相同，自然也会形成不同的理念。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大学都希望追求卓越，希望把研究和教学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但每个大学的特色是在自身发展的几十年到几百年间形成的，无法复制。”

斯坦福大学的卡洛依教授指出，大学的排名基本上没有意义。他甚至说得更直接，在美国，大学排名都是人为操纵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所在的大学教育系，从排名上看，位居第一，而名列第三的哈佛大学还是抢走了斯坦福大学不少好学生，因为哈佛给这些学生提供5000美元的奖学金。“其实，第三与第一的区别就是5000美元的区别，但这就足以改变学生的决定。”卡洛依教授幽默地说。

关键词：升级与扩招

温和观点：片面追求学校升级、部分高校扩招过热应该降温

许多大学已经或志在升格为综合性大学，一些农林地矿专业的学校纷纷改名，成为一种现象。

针对部分高校片面追求升级扩建的做法，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认为“不该如此”。她说，教育部为此出台了一些相关规定，明确提出要阻止这种片面追求学校升级的做法。

“高校扩招是个成就。但是目前，部分高校扩招过热该降温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介绍说，曾经有一所中专经过扩招，一路升为本科，从几千人的规模扩大到几万人。这种过热的扩招是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的。

走自己的路！耶鲁大学校长莱温教授介绍哈佛大学的历史时说，他们既不用英国的模式，也没学德国的模式。这就好比有100个人，就有100个“哈姆雷特”一样，个性化的模式是

最好的。

“在实现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中，任何一所大学不可能是全能冠军，要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单项冠军，以此提升学校的水平和地位。”同济大学校长万钢说。

关键词：大学与科研院所

一致观点：把科研院所放在大学里，利用大学人才、学科交叉优势，能够获得原创性科研成果

法、美等国的许多科研院所都放在大学里，利用大学的人才、学科交叉优势，获得一些原创性科研成果。大学像河流，人才经常流动、知识不断更新；科研院所像水库，储蓄了大量的人才、设备等科研资源。综合性大学汇集了众多的学科，大学天然易于学科交叉，大学培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几年一茬，具有天然的人才流动优势。国内大学与科研院所结合的规模、层次等还不够。

青海大学校长李建保说：“我国高校的科研开发仍处在单兵单打的状态，经费增加快，效益提高慢，应针对重大项目，调动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的力量，进行集体攻关。”

“大学是科技转让的主体”，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库特·赖纳·库茨勒说：“大学不但在科学知识的传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如何解决问题、完成科技的产业化方面也有贡献。”

“大学要进一步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的合作，在服务社会中发展自己。”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说。大学可以利用企业的资源，达到“瘦身”效果，同时获得科研成果转化的更多机会和更多的经费支持。

关键词：一流大学

尖锐观点：不同大学承担不同的职能，应有自己的目标定位

国内一些知名高校近年来纷纷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与国家的奋斗目标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我们要在实现国家的奋斗目标中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他认为，不同学校的最根本区别应是其内在的文化和精神，这是大学的灵魂。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说：“北大有一大批优秀的学者，这是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目前，我们特别需要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如果我们的教师不是潜心于科研与教学，而是整天想着在哪个刊物上发表几篇文章，那么我们就很难实现突破。”

纪宝成则认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师、大楼、大气，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中国的大学正飞速发展，这可使中国有更多的大学成为一流。不过，不需要、也不可能使所有的大学都变成一流大学。在美国，一个州有一所旗舰大学就可以，其它的大学则都有各自的目标定位。”剑桥大学的理查德教授说。

大学校长纵论治校之道

(2004-08-06)

黄蔚 刘琴

首要之道：找准定位

“大学准确的办学定位和理念对于大学校长治校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意义。”耶鲁大学校长莱温教授今天对参加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记者说。

作为世界上最好的、最有办学特色的大学之一，耶鲁大学的成功，除了具有经济强盛、对世界优秀人才及潜在优秀人才的吸引和占有等有利因素外，还有一条就是对大学进行分类管理。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告诉记者，国内办得成功的大学，亦得益于其治校者有适合该校校情的角色定位。北大作为多院系、多学科、多专业，并且彼此之间能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综合性大学，不仅在教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而且在科研成果转化和为社会服务方面也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北大方正成功实现产业化，就生动地说明了学校的准确定位为学校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和核心的竞争力。

“大学的职能在原来培养人才、科学的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的基础上，已经发展到直接为经济建设提供直接的动力支持上了。”科研专家出身的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感慨地说，正是找准了为当地经济建设提供直接的智力支持这个定位，中南大学才从中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在学科建设、科研队伍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关键因素：校长素质

耶鲁大学校长莱温教授在8月4日的演讲中，着重谈了一位有影响的大学校长应有的几个素质。这些素质包括：能够把大量的时间集中在主要的行动上；能够制定远大而且能够实现的目标；能够形成一个激励机制，以确保员工个人的目标实现与学校的成功发展相结合；制定引领大学前进的远景和敢于冒险、不为初次的失败所阻挠，等等。

曾经在耶鲁大学任教30年，并担任过该校教务长的剑桥大学现任校长理查德女士告诉记者，与美国的大学相比，剑桥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获得充足的资源，美国大学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财务支持明显比英国的高校要多许多，中国的复旦大学等名牌大学也同样面临着教学和科研经费并不充足的问题。

“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大学校长来说，不能只依靠政府，还要争取从企业、社会机构乃至个人手中获得资助，建成类似美国那样的捐赠体系。”理查德校长说，这对于校长本身的要求就更高了，不仅需要有更加清晰的头脑，更需要有充分的论证和准确的决策。

必由之路：引财引智

对于大学校长来说，如何更好地引财引智既是职责所在，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此，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有自己的观点和办法。王生洪说，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家拨款，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要在国家资助的基础上大力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争取更多的科研基金，然后，还要努力争取社会支持，通过校友基金会等形式获得海内外的捐资支持。除此之外，还要大力发展学校的科技产业，建设科技园区，通过技术成果转让、高技术企业引入等方式筹得资金。

在师资建设方面，王生洪说：“如何才能吸引优秀学者？这不完全靠经济待遇，更重要的是要让他看到我们国家教育事业的前景，看到学校良好的发展前景。”他说，好的学科基

础非常重要；其次，还要以文化环境吸引人，比如，学生自由讨论的气氛、学术研究的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等；第三，也要有优厚的工作待遇，通过全职或兼职多种方式吸引人才。

要敏锐地判断出目前世界上哪些学科、领域是先进、有前景的，对这些学科的优秀人才，按照需要主动出击，发挥特长委以重任，使得重点学科上集中力量，早日获得突破。这是记者采访的几位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共同心声。

“圆桌会议”：聚焦大学发展战略

(2004-08-10)

唐景莉 黄文 杨晨光

2004年8月5日下午4点，7位中外大学校长和一位教育专家围坐在一起，畅谈不同类型的大学定位和发展战略，掀起了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一个“思维风暴”。

主持人是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他的开场白很简短，但很有内涵。他说，全世界的大学多种多样，比较普遍的分类有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和单科性大学等；从性质的角度还可分为研究型、教育型或者研究教育型；从经费来源有公立、私立等；有的大学校长还认为大学所处的不同地点对大学的发展战略也有影响。今天，我们听听各位校长专家的高见。

随后，是两个多小时的“精神大餐”。中外校长们引经据典，中外比较，纵论各类大学的发展之道。

伦敦经济学院院长戴维斯：夹缝中生存，市场上定位

我们学校最初是由一批社会活动家创办的，他们认为传统的大学是由于宗教目的而创立，但是伦敦经济学院要为普通劳动者和工薪阶层创造受教育的机会。现在学校得到社会的支持和影响非常显著，特色也很鲜明。首先我们不是综合型大学，而是研究型大学；其次学校围绕社会科学进行学科设置；再次是高度国际化的学校，哥伦比亚大学有5%的外国留学生，而伦敦经济学院有2/3的学生、40%的教职员来自英国以外，其中也有华裔，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大学的独特之处。

究其原因，主要是历史因素，人为痕迹较少。因为我们从源头上讲是从伦敦大学的一个社会科学学院转化而来；从国际上说，为增强国际竞争力，英国资格严格控制向学生所收的费用，要求必须低于教育投入，这样才能面向世界，保持科研竞争力，慢慢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虽然我们仍然是政府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但每年只有1/8的经费来自政府。我们把学校设在大城市，一方面接近政府机关，另一方面也靠近金融中心，深受学生欢迎。

根据英国资格内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有逐步结合的趋势，针对我们学校规模小、学生少的特点，我们还是坚持采用国际化战略，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夹缝中求得生存，过去的四任校长都是这么做的，我还将继续坚持下去。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伯林格：高薪揽英才，海外建分校

从过去到现在的一百年间，美国高等教育最大的发展就是大学在不断地融合和合并之中，大学的相似性越来越高。因此我们所采用的做法主要有两点：

第一，增加自身的竞争力。这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社会发展造成人们的价值观向着令

人质疑的方向转变，大学想招聘一个研究人员，他们都会开出 20 万到 40 万美元的年薪，有时甚至会提出 100 万美元的天价。所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了防止人才的流失，每年要花 100 多万美元，开会或者请人作演讲，稳定人心。要是理工类学校花钱会更多，像纽约大学采取明薪制，外来的人才拿钱更多，这就是残酷的竞争现实。

第二，采取国际化战略，在继续保持国内基础的条件下，和世界其他大学合作，这是标准的做法，我们还在国外建立分校，比如应卡塔尔政府要求在那里建立了工程院和医学院，这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还打算在北京建医学院，专门招收中国的学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利用互联网进行国际扩展，求得更多教育的机会是不可行的，目前还没有哪一所大学的做法能够真正把互联网与教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远程教育的吸引力还很弱。在美国，几乎所有大学的网上教学活动开展得都不很成功，我们正在寻求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解决最终将使所有人得利。

巴黎十一大校长阿尼塔·贝塞里尼：多学科发展 为产业服务

女校长阿尼塔·贝塞里尼在自豪而简单地介绍了巴黎十一大大学的情况之后，谈到学校的发展。他们的做法是无论硕士、博士都继续向纵深发展，因为现在社会需求双能力、三能力、多能力的学生，如学习物理、化学、经济、法律的学生也要具备信息能力，这使学校向多学科发展。学校制定战略是从世界角度出发，同时作为法国重要的大学要融入国家发展的框架中。学校与国家签订合同，可以很好地发展想发展的领域。

另一个战略问题是成果转化，为产业服务。市政府、地区议员任期为 7 年，他们有一个 7 年的发展规划，时间相对较长。我们与当地签署项目研究合同，使研究成果尽快产业化，服务社会。现在法国有一些小型企业与学校联合开发项目。

无论是教师，还是教师兼研究人员，或者是研究机构，都会产生许多好的想法，由学校出面将大家联系、组织起来共同研究。比如校外相关机构研究人员可以到学校实验室来工作，同时也兼任一些教学工作。在大学这一组织下工作，我们会有不同的研究中心更好地组织跨学科研究。

在国际化方面，巴黎十一大多年来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多种合作，如联合培养博士生，优先选择与亚洲、中国的合作项目。再一个是派学生到国外。现在进入欧洲学位一体化时期，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一体化，学生可以量体裁衣，可选择相关培训人员、选择到国外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战略转型 结构优化

“制定大学的发展战略可以参考 SWOT 原则。”刚刚从中央电视台录制完节目就赶到中外校长论坛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认为，“大学制定发展战略要考虑学校的优势、不足、机遇和目标，这样才能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指导，科学定位，明确目标。”

这位来自中国师范大学领校学校的校长谈到，北师大正在实行战略转型，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转型。教师教育在朝着高等教育化、来源多样化、职业专业化、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一体化的方向发展。面对这些发展趋势，北师大既有压力也面临着机遇。确立战略转型，既是学校自身生存和发展以及全方位服务社会的必然选择，也是创新教师教育体系、提升教师教育水平的重要基础。为此，我们将采取几个策略：一是学科融合和院系调整，例如组建教育学院；二是专业设置调整，宽口径招生，宽口径培养，提高学生的适应力和竞争力；三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如本科生取消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的差别，按照“4+2”模式培养教育学硕士。公众对优质教育资源有着强烈的需求，北师大要尽可能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满足社

会对教师的高端需求。

钟秉林说，北师大非常注重学术水平的提升和科研成果的产出，坚持科学发展观，注重结构优化，以质量和效益取胜。总之，大学要分析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前瞻性的战略选择。要采取多样化的发展战略，避免大学趋同，盲目攀比。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我们处在十字路口

陈章良的发言透露出困惑与忧虑。他说，现在农业大学面临几个难题：一是招生难，学生对学农业积极性不高，第一选择不会选农业，尤其是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学农业。二是毕业生就业难，原来的毕业生会去农村，现在都是独生子女，都想留在城市。今年我们学校学经济管理的学生参加招聘，人家一听是农大的就说，我们不要学农业经济管理的学生。其实我们学校经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与其他学校的一样。三是农村中出现大量乡镇企业，农村城镇化在扩大，农业院校如何适应这些变化，高新技术如何运用于农村，对农业大学是个挑战。中国有 60 所左右农业院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办这么多的农业大学。国家需不需要这么多农业大学，农业大学怎么办？所以说农业大学现在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

针对中国农业大学的困惑，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卡诺伊提出他的看法。他指出，学校要培训学生，使之建立公司，而不是找工作，如可以大量培训中国农业工程师。此外，学校本身要有灵活性。

卡诺伊说，是专业化还是综合化，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学的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考虑大学的类型，并且要注意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中国的大学应当坚持多样化的发展战略。现在有些小型文科院校喜欢改校名，这不是一种有长远眼光的做法。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因为已经超时半个多小时，主持人宣布圆桌讨论暂时告一段落。会后，许多校长仍觉得意犹未尽。

大学定位：有特色才有生命力

“如今一提建设高水平大学，言必称争名校、创一流，恨不得个个都成为哈佛、牛津。所有大学都往综合化发展，向学术型转变，这种趋势如果愈演愈烈，最终将使很多学校丧失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不少大学校长对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界存在的一些贪大求全的现象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忧虑。

迷失于“高、大、全”的误区

“现在的大学越来越没有自己的个性了，盲目追求‘高、大、全’，中专改大专，大专改大学，大学有了本科招硕士，有了硕士招博士，所有的‘学院’都要改名为‘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感叹地说。

早稻田大学校长白井克彦说，日本大学的定位较为务实，二流的大学着重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会去高攀世界的尖端科技，也没有短期大学(专科)要极力升格为本科，一般的本科大学也不会去与研究型大学攀比。

一流并不是办学层次越高越好，而是指在各自所处的类型中把学校办得最好，办成一流。教育部部长周济对此曾多次指出，当前各校办学思路的致命弱点是缺乏个性，模式趋同，定位不够准确。周济举过例子，有的高等职业学院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办出了自己的特色，

发展势头非常好。但是他们总是将学校的前途寄托在“升格”上，觉得如果不办本科教育，就无法体现一流。结果，全校工作的重点、学校领导的兴奋点都转到办本科上面，学校变成了本科的“压缩饼干”，也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

缘何“宁当凤尾，不当鸡头”？

一些校长分析，高教界这种贪大求全的现象与学校的办学思想、宏观战略以及学校领导的水平、视野等有很大关系，而目前政府、社会的导向以及各种评价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演化。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王子镐说，从大环境讲，现在的资源分配方式或者说政府拨款方式就主要趋向来看，是往高的方向发展，一些学校不顾自己的条件而拼命争取到高一层次，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政策条件比从前好很多。比如，过去在大专层次上非常有名的几个大专院校都纷纷升级为本科，为什么不安于做非常优秀的大专呢？因为当前大专受到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社会上也有种“重本轻专”的偏见。所以说从体制和政策上都不太利于引导大学按照自己的特色去认真定位，这不光是大学校长自身发挥角色的问题。

王子镐说，要使各个大学都各安其位，政府的主导功能和相关政策要让学校感到，当了“鸡头”所获得的支持比当“凤尾”要好得多，他就会安于“鸡头”而不做“凤尾”。

“作为重点大学来说，提出综合性的发展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要辩证地认识‘综合’和‘特色’的关系，要以特色带动综合，以综合强化特色。”同济大学校长万钢说，世界高水平大学，比如像莫斯科大学，在一个国家也就那么一二所，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大量的大学是以特色而著称的。任何一所知名大学，都不可能说任何一个学科都知名，而是保证单项学科水平的提高，只有单项冠军多了才能逐渐走向一流大学。因此，必须根据自己学校的特点，根据学校传统学科发展的优势来决定学科发展的整个战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张锦高说，一味追求综合性，反倒可能丢掉原有的优势，得不偿失。“地质大学在地学方面的研究与国外差距不大，我们就要好好研究如何拓展学科优势。”张锦高说，学校目前已经依据优势，突破“找矿”为主的传统任务，使学校研究方向逐步发展到“人和地球协调发展”的更具现代意义的课题上来，如信息技术如何向海洋进军等。

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多样化的

“没有特色就不是好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乃芳在规划学校发展时，把“特色”建设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陈乃芳说，北外把位置定在了培养多语种复合型外语人才上，即外语+专业的培养模式，在外语之外开辟了诸如新闻、法律等非外语专业。“外语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和特色，北外任何学科的建设，脱离了外语这个特色，就无法和其他学校去竞争，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多层次、多样化的，真正对政府、社会和下一代负责的做法是每所学校都要科学定位，包括学科领域、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办学规模以及办学目标。”纪宝成说，任何层次都能办出特色，办出一流。特色就是战斗力，特色就是竞争力，要“异峰突起，出奇制胜”，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不同类型的大学有不同的功能，一个国家需要一些世界知名大学，但绝不需要所有大学都变成有名的大学。”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在讲演中这样说。对于国内许多高校来说，在向高水平迈进的同时，更需要突出特色，准确定位，跳出“高、大、全”的误区，精心谋划学校改革与发展的未来。

—————摘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

★海外高教★

美国《新闻周刊》谈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现状

美国《新闻周刊》9月15日一期发表文章，分析世界各国高等学校的现状：
这边窘困那边风光

700年来，历经沧桑的罗马大学经历了无数次战争和政变的考验。如今，随着新学期的到来，这所欧洲最大的大学却面临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难题：学生没有地方坐。在罗马大学的18万学生中，很多人将不得不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上课，其他人则在电影院里学习（一些电影院在晚上还兼营色情生意）。和去年在停车场上课的社会学系学生相比，他们运气还算不错，至少他们头上还有屋顶。在罗马大学的法学院，注册入学的学生已经超过4万人，他们必须提前打电话预定座位才能在课上占据一席之地。那些被拦在门外的学生常常站在外面，透过窗户向里面张望，希望能听到一部分讲课内容，甚至在下雨天也不例外。

这只是我们在罗马看到的情况。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教育工作者必须绞尽脑汁应付不断上升的辍学率；在一些大学里，三分之二的学生拿不到学位。事实上，纵观全球各地，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大学都在和自身的棘手问题相抗争。在韩国和日本，学校不是人满为患，而是生源匮乏，以至于这两国的教育者都为日益下降的年轻人数量和迅速减少的合格申请入学者而担忧。也有很多地方为钱而犯愁。英国的学生抗议政府把学费提高两倍的议案——很多高校的管理者将该议案带来的收入视为学校的生存之道，而学生们则认为这会使自己在毕业时欠下一屁股债。巴基斯坦的教师哀叹薪水太低，难以吸引顶尖的人才来执教。

在某些发展中国家，战争和政治动乱几乎让教育停滞不前。例如，对于很多非洲人来说，基本的识字能力都还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再来看看美国，那儿的大学教育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难怪世界各地有如此多的精英分子渴望到美国求学。预计这个月将有近60万国际学生抵达美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印度和中国。纽约国际教育学会会长艾伦·古德曼说：“毫不夸张地说，在这儿我们可能有100万国际学生。”

大学财政谁来买单

很多国家的教育工作者说，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几乎完全依靠政府资助办学，美国除外，这大概是这些国家由来已久的传统。如今，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面临的财政预算压力日益加重，政府向学校提供的经费也大不如前了，教育工作者很难另辟蹊径，来为大学和他们自己支付账单。

俄罗斯是问题最突出的国家之一。在过去10年中，俄罗斯政府对学校的财政支持不断缩减，很多大学的处境每况愈下，甚至学校的建筑物也不能得到及时修缮。在圣彼得堡西北公共管理学院念书的22岁学生克里斯蒂娜·科谢尔说：“即使走在学校里都觉得危险。那儿的建筑物破旧不堪，简直到了可怕的地步。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是何等糟糕。”此外，削减预算还意味着教授和学校管理人员的工资比以前少了；学生们说，很多教职工开始接受贿赂，以“填补”工资收入。

即使是一度被视为全球最好的英国大学如今也为钱所困。“混乱、迷惘、资金不足和愤怒”是英国现代大学联合会负责人科林·马西森对教育系统目前所处状态的描述。在过去15年里，英国大学的学生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而政府补助却减少了36%以上。如今，英国对

高等教育的投入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1%，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与此同时，政府还向议会提交议案，要求把英国大学的学费增加到每年 4500 美元左右，这几乎是原来的三倍。虽然用美国大学的标准来看，4500 美元并不算多——一些美国大学每年的学费超过 2.5 万美元——但很多英国学校都担心，这一政策会把有能力的学生拒之门外。

在英国的大学中，教员薪水也远远低于美国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高水平教师的大量流失。三年前离开牛津大学前往纽约大学任教的哲学系教授克里斯托弗·皮科克说，资金不足导致学术界精英的流失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他说：“英国大学的薪水实在太低了，但我认为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那儿没有研究设施。譬如说，大多数英国大学都不会给高级研究人员定期发放科研补助金——我在牛津大学从未拿到过这样的补助金，甚至连椅子都没发过。”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这种差距更为突出：只有美国大学能提供一流的研究设施。

教育改革各有侧重

100 年前，德国大学的地位和今天的哈佛、耶鲁和斯坦福大学相当，吸引着来自全球的学生和教授。然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德国的大学开始走向衰落。如今德国正在进行教育改革，其中很多地方显然是向美国看齐。

在欧洲其他地方，教育改革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1998 年，欧洲各国教育部长在巴黎大学集会，祝贺享有盛誉的巴黎大学 800 周年校庆，会议首先就讨论了参与全球竞争的必要性。

第二年在博洛尼亚召开的峰会上，来自 29 个国家的教育部长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启动了一场遍及欧洲的高等教育评估，其目标是在全欧洲建立统一且更具弹性的教育系统。这场改革预计在 2010 年完成，但目前仍然存在抵制力量。法国现任教育部长吕克·费里认为，目标不应该是把法国大学变为哈佛或斯坦福大学的复制品，而是要使法国重新成为外国学生留学的首选。4 年前成立的法国教育协会的主席弗朗西斯·布拉蒙说，他们的宗旨是：“‘推销’法国大学，就像我们推销香槟酒和香水一样。”

在很多国家，对技术研究的渴求推动了教育改革。如今，剑桥大学已经成为欧洲硅谷的中心。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剑桥的管理者就开始积极倡导企业化和工业合作——这种做法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忌。仅去年一年，剑桥就进行了 25 项高科技风险投资，这些项目可能最终为大学盈利。在印度，比尔·盖茨把七所优秀的印度理工学院誉为“改变了世界的杰出大学”，而它们的建校历史仅有 50 年而已。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不仅是印度新兴高科技产业的主力军，也已经成为美国硅谷的中坚力量。

在日本，一度默默无闻的地区性技术学校已经崛起为教育典范。金泽理工学院尽管还没有达到东京大学或早稻田大学那样高的名望，但它宣称自己的学生有 99% 在毕业前就落实了工作。在增长缓慢的经济下，这一比例相当可观。这种转变开始于十几年前，当时金泽理工学院开始成批送教授和教职工去美国大学观摩教育和运作模式。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它启动了一项改革，强调实际动手能力。学校建立了“梦想与创意工厂”，学生们可以在那里制造投篮机器人或太阳能汽车。它还和日本工业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从而得到了大量的额外资金。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从本校研究和开发结果中获取商业利润。

私有化改变了巴西高等教育的局面。尽管该国很多公立大学日益凋敝，私人教育却方兴未艾。如今近 70% 的学生都在私立大学注册。其中的几所私立大学（如里约热内卢的天主教大学）现在被认为是该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巴西还在试行一项名为“统考”的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用于检验大学教育的效果。世界银行的教育分析家克劳迪奥·莫拉卡斯特罗说：“以前我们评估高等教育完全凭猜测。有了‘统考’，就像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之后突然有人指明了道路。”

在未来几十年里，随着高等教育日益成为一种全球化商品，像巴西的“统考”或金泽理工学院的“梦想与创意工厂”这类新思路将让教授和学生们远离传统理念。这将成为世界各

地的大学从美国模式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美国总是鼓励教育多样化，以自由竞争的市场为导向。美国大学注册和招生办公室协会的巴尔马克·纳西瑞恩说：“我们让人们自己决定。”换言之，谁的教育方法最好，谁就是胜利者。

——摘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

日本大学改革的最新态势

中国驻大孤总领事馆教育组

一、日本文部科学省日前出台了新的“大学机构改革方针”，确定日本大学今后将重点推行以下改革：大力推进国立大学的重组与合并；在国立大学引进市场管理机制；引进竞争机制，重点建设 30 所世界一流大学。

国立大学的重组合并，是根据不同大学和不同领域的实际情况进行重组合并，大幅度减少国立大学数量。例如，根据日本出生率的降低对教师需求较少的实际情况，对师范大学和师范系进行重组或缩小其规模，并考虑将其移交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将医科院校等单科大学与其他大学合并，并考虑将其移交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推动大学和院系实行区域间的重组与合并。

在国立大学引进市场管理机制，是指大学管理人员可以聘请校外专家担任，明确其管理责任，推动其机动灵活并能从战略高度进行经营和管理；引进重视能力和业绩的新的人事管理体制；将国立大学附属的学校、商学院等从大学分离出去，使其成为独立的法人学校。通过上述措施，推动国立大学法人化的尽快实施。

引进竞争机制，重点建设 30 所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措施是：引进第三者评估体系，聘请专家和民间人士对大学进行评估，将评估结果向全社会公布；根据评估结果，对排位在前 30 名的国、公、私立大学给予重点经费资助，并推动 30 所大学加快发展，努力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二、民间企业专家将进驻国立大学。为落实日本政府关于通过大学创办高科技园区刺激日本经济复苏的方针，日前，日本文部科学省制定了关于聘请民间企业专家进驻大学的实施计划。该计划规定：挑选民间企业中具有较强洞察商机能力的专家到大学长期开展工作；专家从民间企业中具有从事专利业务经验的人员中挑选，第一批将于明年派驻 10—20 所国立大学；专家队伍今后 5 年将扩充到 700 名。

据介绍，迄今日本大学的基础研究大多是偏重研究，轻视实用。民间企业中具有较强洞察商机能力的专家进驻大学后，可以根据大学的科研成果制定创办高科技产业的计划，将其推荐给现有的企业，为大学和企业发挥牵线搭桥作用。日本文部省此举旨在推动大学加快高新技术的开发以及大学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促进教授、学生创办高科技产业的数量迅速增加，改变大学科研成果不能迅速产业化而影响国际竞争能力的现状。

三、通过网络对函授学生进行“在家”考试。福祉大学日前对该校函授部学生通过网络进行了“在家”考试。即学生可以不去考场，在自己家里通过网络参加学校进行的考试。

据介绍，为防止“在家”考试出现作弊问题，该大学对“在家”考试学生进行了条件限制，规定学生参加“在家”考试之前必须参加 4 次测试，且测试成绩必须达到一定标准以上；学校通过计算机将每个学生的各次测试成绩进行记录，然后通过纪录成绩与“在家”考试成绩进行比较，鉴别学生“在家”考试成绩的真伪；所有参加“在家”考试考生的试卷都不同；

试卷由计算机处理生成。做法是从 100 个试题中挑选 40—50 题，通过计算机进行组合处理，使每个科目的试题组成大量不同试卷；如果个别试卷出现偏难情况，有关系统可以通过统计处理进行适当修正。

日本福祉大学的“在家”考试系统由该校和日本富士通公司联合开发，使用该考试系统考试不需考官监考，既可防止他人代考，也可防止学生考试作弊。该大学介绍说，实行“在家”考试做法，目的是节省考生去考场的时间和费用，为社会成人学习提供方便。

——摘自《中国高等教育》2001 年第 17 期

▲会议动态▲

2004 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专家谈高校发展与定位

杨 晨 光

创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与合作的需要。但对大多数高校而言，需要根据自身的历史背景、环境特点、学科特色、资源结构等实际情况，制定本校的发展战略规划，不能盲目地追求“大而全”。这是日前在珠海举行的“2004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一再强调的教育理念。

多位教育界的专家、学者表示，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人的发展对教育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是分层次、多类型的，中国高校的发展要在突出个性上下工夫，在形成特色上下工夫，进而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

科学界定自我角色

江西副校长眭依凡认为，学校界定自我角色要科学，办学与办企业一样，产品定位要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有了强烈的角色定位意识，高校才能格外重视自己独有的办学追求并强调自身办学特色的形成。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蔡克勇将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比作一个大宴席，再好的一桌菜都是鱼翅海参也不行，多种口味才能满足不同人的需要，各种菜系只是类型的不同，不能说哪一种更好。高校在发展中首先是要清楚自己适合做“鲍鱼”还是做“泡菜”。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伍德罗·威尔逊认为，普林斯顿不像哈佛，也不希望变成哈佛那样；反之，也不希望哈佛变成普林斯顿。

摆脱误区才能把握特色

“中国很多高校都不安于现状。”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王义遒认为，高等教育应当是在较宽广基础上的“专门教育”或“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门教育”，回避“专门教育”就不可能有高校正确的定位。现在用人单位追求高学历，凭“名分”现象较普遍，这样会对学校产生误导。社会对人才应该“按需论用”、“按质论价”，让人才市场引导高校定位合理化。

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副校长汉斯·罗斯伯格希望中国高校不要陷入纯粹的教学和研究，这样与学院或者研究机构没什么区别，要加强和社会的互动，让社会了解到什么是最前

沿的科学，同时推动生产力方面的创新，发挥实用性。

上海市教委主任张伟江表示，近年来，社会对高等学校提供有巨大创利能力的“高新技术”的期望越来越强烈，企业要什么都能干的“复合型”人才，使得高校在社会这个急躁的功利场中几乎无所适从，一听“纳米”，几乎家家搞纳米；一听“基因”，不搞基因似乎就没水平，这样创“特色”可以说就失去了特色。

在各自类型中争创一流

谈及高等学校的分类问题，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认为，高等学校的分类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又是中国当前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分类，每一类型都应有重点院校，都可以办出自己的特色，成为国内（省内）知名、国际（国内）有影响的名校。

“法国巴黎十一大学的做法是让硕士、博士都继续向纵深发展，因为现在社会需求双能力、三能力、多能力的学生。比如学习物理、化学、经济、法律的学生也要具备信息能力，这使学校向多学科发展，融入国家发展的框架中。学校与国家签订合同，可以更好地发展想发展的领域。”法国巴黎十一大学校长阿尼塔·贝塞里尼自豪地说。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会理事长杨德广提出，研究型大学主要培养“高水平、高素质、有研究能力、创新能力”的复合型拔尖人才；教学型大学主要培养“宽口径、应用型”人才；职业技能型大学主要培养“第一线的、实践能力强的，管理、技术”人才。各类学校安于本位，不要跟着“排名榜”走，反而能够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OECD：给中国高等教育的政策建议

伊万·韦特曼 OECD 非成员国合作项目主管
范文曜、马陆亭摘编，王燕、杨秀文校译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近日召开的“高等教育发展与财政政策国际研讨会”上，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 OECD）公布了关于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财政拨款考察的报告。该报告基于 2002 年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温得海默和英国阿伯丁大学前任校长伯格为首的 OECD 专家小组对中国进行的访问研究。OECD 的考察报告着重考察高等教育的财政和教育质量，对这两个领域，OECD 提出三个主要的政策建议。

教育质量谁说了算

中国高等教育应该建立一个质量管理和审计制度，并为这项工作提供专项资源，这项制度将贯彻到教育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整个教育的规划和实施过程，包括中国高等教育的如下阶段：根据需要确定教育目标；确定教学大纲，设计课程；确定适当的教学方式途径，选择教育方法；实施教学；评估整个教育过程。

教育要关注结果

评估教育质量必然要关注结果，并且必然要关注高等教育比较宽泛和长期的效果，比如，高校毕业生能否找到很好的工作？在工作和生活中他们能否继续发挥自己的潜能？他们能对社区和国家发展做出有益贡献吗？不管这些问题量化和测量起来难度多大，都应该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方面。

质量标准由谁来定

质量应由与之有利害关系的人决定，不能仅由高等教育部门决定。政府和个人都投资于

教育，两者在教育的结果中都有利益所在，因此，两者都有权利决定教育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国家主要把重心放在国家的发展，学生则主要考虑就业能力和事业发展机会。高等院校发展既要制定目标，也要满足企业的需要以及高等教育服务用户的需求。

中国高等教育需要一个保证教育过程一致性的质量管理系统，教育质量不应因个体不同而有别，至少相同的科目在同一所高等院校中由两位不同的教授讲授时，在内容、方法和重点上应该不会有很大差异。高校应该能够及时发现这种偏离，并加以修正。仅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对教授的表现进行评比(例如，学生评估)，并以此决定老师的奖金，这样做是不够的。质量保证不只服务于学校管理的需要，也要符合学生和社区的需要。

由第三方组织认证

为了保证质量管理体系的完整性和可信度，第三方机构认证无疑是最好的选择，ISO10015认证体系是较好的选择。

高校资金从哪里来

考察小组建议，中国高等教育学费应大幅度地增加，应该改变政府拨款的比例，补充因扩大学生贷款计划而提高的主要成本，具体实施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修改贷款方案

中国目前实施的是通过国有银行进行的政府贴息贷款制度，这种贷款制度开始于1999年，已有约800万大学生受益，平均每人贷款3600美元。中国高等教育从1995年开始以7.2%的增长率增长，2003年第一批贷款人涌入劳动力市场，毕业生失业原因更加复杂，现行的偿还规则还导致违约率增加(占20%)，有约100所学校已列入银行“黑名单”。

鉴于以上情况，必须改变还款方法。根据学生的经济状况，所有无力承受学费增长负担的学生都应该获得贷款以支付他们的学费和住宿费，即增加贷款计划的参与者。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应该得到全额贷款，而大多数学生(除了最富裕家庭的学生)都有资格在支付学费上获得一些帮助。偿还计划的要点包括：在学习期间，贷款是无息的；在毕业之后的一段时期(如5年)，贷款利息应该减半；此后，贷款应该是全息的。这就需要国家和学生都来投资。

在证明毕业生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得到回报时，才应让他们开始偿还贷款。如果毕业生一直没有达到这一收入水平，或者在退休或死亡之前，贷款还未完全偿还，贷款(或余额)应该由政府支付，而不应该由毕业生支付。此贷款计划的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把高等教育费用的负担从学生家庭转移到学生自己，学生贷款不会只是贫困学生的特权，而是国家和学生及其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制定学费标准

中国每所大学和学院以成本的平均估算值(该平均值的25%)为基础，制定了每个课程的学费标准。考察小组了解到，大学生每年的学费在3,000至10,000元之间(后者是一些非常昂贵的课程收费标准，如艺术)。

考察小组建议，学费的标准不应该为了反映某些特别课程的高费用而区别很大，而应该单独以学术价值为基础核算。考察小组建议，对于一些处于最高费用序列的大学课程，全额成本的收取只按照收取费用标准的最低限，费用标准较高的学费应低于全额成本的收费(以避免有能力的学生因怀疑不能偿还贷款而逃避这些课程)。

这样，想要在一流大学上学的学生支付的学费只是略高一些。从这样的大学得一个有声望的学位，略高一点的学费是可接受的，因为毕业生得到高薪工作的可能性很大。即使得不到高薪，所建议的这种偿还计划将确保毕业生不会导致财政后果。

基于这个理由，考察小组建议，学费计划的目标应该定在涵盖实际成本的50%-60%的幅度上。适当的人头拨款应该继续拨给有关院校，补偿学费不能覆盖全部成本的部分。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政府“节省”的拨款应该被用来支持提高学生贷款计划。

特别财政/投资项目

中国政府应该继续为一流大学拨款。最近几年，政府通过“985”和“211”工程为一流大学拨款，避免因为扩招而影响教育和科研质量。在这些工程下，以项目为基础的拨款目的包括了建设和修缮学术大楼。考察小组观察到，许多一流大学的设施是高标准的。改进设备必然增加运营成本，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新的、尤其是为自然科学服务的建筑物，需要聘用较高水平的维护人员，对仪器的要求更高。

根据前面谈到的学费标准，一流大学从学费中只有较低比例的成本补偿，专项拨款会继续弥补这种“不足”。为了取得比较满意的实施方案，政府不得不与所有的院校达成一致意见，每年定期检查，根据每类院校的教学成本确定能够接受的学费标准。之后，通过设定可接受的学费标准，政府将同意对“不足”部分给予补偿。

推进地区性发展

进一步改进贷款计划将有助于政府解决贫穷省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例如，解决如何使一些重要专业技术岗位吸引住人才等问题。毕业生关注偿还贷款的能力，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以“赎回”贷款为条件让他们服务于贫困地区。举例来说，一个毕业生在贫困地区的一个岗位服务 10 年，可以免去这段时期的利息，并在合同到期后，免除全部贷款，根据合同的长短决定折扣的多少。

贫困地区的学 生一般不愿回到家乡服务于当地，而是喜欢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城市或省份就业，因此，政府应该为地方中学和高校提供最好的校舍、最好的教学设备与设施，并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好的师资力量，提高它们的办学质量。

确保管理信息准确、高效

实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一个“以效率为基础”的信息管理系统。事实上，前述两项政策选择方案的有效实施都有赖于一个有效的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在提供数据时具有相关性、及时性、准确性、可理解性和成本有效性等特点。

将结果与成本做比较

高等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不能孤立地看待受教育程度、成绩或产出等数据(例如，就业的可能性和收入)，应该将结果与成本做比较，这样可以评判哪些院校和课程计划是最有效率的。

三个步骤

在中国，建立以效率为基础的高等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将分三个步骤展开：确定该系统的潜在用户对数据的要求，设计数据收集、吸收和传播渠道，信息系统运行要分阶段进行。

教育部有必要召开一个会议，中央、高等院校的行政管理人员(后者包括那些来自民办高校管理人员)、学生、社区官员和公立、私营部门的雇员参加，界定理想的数据，与提供这些数据所花费的成本进行比较。从需求出发，至少要求数据安全有三个级别：最高等级是关于每个学生和员工的信息，第二等级是关于高等院校的信息，第三等级是诸如入学率、课程提供和现行数据系统下可获得的数据等信息。

责任、义务是核心

有五个发展趋势使高等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处于重要地位：中国高等教育地域覆盖面积迅速扩大；在数量和成果的多样化方面复杂性增大；资源有效利用的压力加重(这是由于中国所能提供的财政支持面临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冲击所致)；部门所承担的责任、义务要求加大；使用成本相对较低的技术来处理大量的数据。其中，责任、义务应该是最核心的问题。由于教育规模和复杂性的增大，以及近期经费的紧张，高等教育管理人员发现，把决策建立在更丰富、更科学的信息基础上是非常必要的。

——摘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

◎ 论点摘要 ◎

论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

笔者指出，重新审视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对于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高校教育教学水平具有积极意义。笔者认为，高等教育质量作为一个多层面、多样化的概念，其内涵至少应包括：(1)人的质量，即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人。这种高素质的人，要有信仰和精神，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和文化素质，具有正确的思维方式、较强的思维能力，具备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2)事的质量，即教学质量、科研质量和管理质量。教学质量首先是课程体系的质量，其次是教材的质量，再次是课堂教学质量。科研质量，就教师而言，就是知识的创造量，知识的创新程度，知识的可应用性，就学生而言，就是学生参与科研的程度，科研意识，科研的基本方法的掌握。管理的质量集中体现在学校层对学校发展方向、发展重点、发展方式、发展进度的决策水平。(3)制度的质量，即推进管理制度创新的水平。为此，要考虑办学资源是否得到了优化配置，以实现经费、师资、设备等要素重新组合，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功能，并降低教育成本。(4)文化化的质量，既建设高雅且充满活力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在人文教育中的熏陶作用不可忽视，更不可替代。（蒋冀骋文）

摘自《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6)

中国大学排行的比较分析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大学排行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众说纷纭，利弊参半，但无论怎样，科学的评估与排行首先应该建立在对大学科学的定位与分类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当前国内的大学排行存在的问题是：(1)数据来源的公开性和客观性不够；(2)数据计算方法和详细过程的透明度不够；(3)对大学分类研究不够；(4)指标体系设计的指导思想不够准确，指标体系设计不够合理；(5)指标内容的权重赋值的科学性不强等。笔者认为，应确立科学的大学排行指导思想，具体要求是：(1)遵循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质量评价观；(2)实行多元化的评估标准；(3)政府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分类指导，提高大学排行的可比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等。笔者对参与大学排行的民间排行机构提出建议的同时，也对政府对大学排行应采取的对策提出建议：(1)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和评估形式的多样化；(2)公开数据来源；(3)规范文档管理；(4)加强高等教育法制法规的建设；(5)增加绩效评估和效益分析；(6)垂范典型；(7)社会和各类大学对民间大学排行的姿态应该是心态豁达，肚量包容，坦然对待，理性分析，而国家教育部门应该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有的放矢，正确引导，促进民间大学排行朝着科学、客观、公正的方向发展。（陈棣沐文）

摘自《理工高教研究》（武汉），2005，(1)